

11

# 理论与实践

LIILUN YU SHIJIAN



11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 目 录

资产階級法权必須批判 .....	杨奎章 ( 1 )
对按劳分配的認識 .....	雷 强 ( 6 )
論“三个并举”是毛澤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設 理論的重大发展 .....	卓 群 ( 10 )
略論大搞鋼鉄事业 .....	沉 潜 ( 15 )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和分配关系的性質問題 .....	高天放 黄 迅 ( 18 )
重讀“改造我們的学习”的一点体会 .....	孙 冰 ( 22 )
进一步开展对资产階級学术思想的批判 .....	本刊編輯部 ( 24 )
刘节先生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論批判 .....	戴裔煊 ( 26 )
刘节先生所著“历史論”批判 .....	中山大学历史系四年級学生姜伯勤 黄宣民 ( 31 )
广州市郊三元里农民学哲学的收获 .....	赵一之 ( 34 )
韓愈思想批判 ( 上 ) .....	杨荣国 ( 36 )
再論陈白沙哲学 .....	陈玉森 李錦全 ( 43 )
大德乎? 小德乎? .....	向 群 ( 48 )
为共产主义鳴鑼喝道 .....	希 梁 ( 49 )
評陈著“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 .....	张 磊 ( 50 )

## 动 态

广东省全党全民学理論热潮繼續发展

“广东历史資料”即將出版

广州市举行工人农民学哲学心得座談会



## 資產階級法權必須批判

楊奎章

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正以最高速度向前发展。鋼鐵、粮食的产量成倍地增加，劳动人民中“拼命工作、不計报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思想风格大大发扬，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正在迅速发展。所有这些，都将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并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准备着条件。“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作出了伟大的預言：“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經不是什么遙远將来的事情了”。

要逐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原則，除了要具备：（一）社会产品极度丰富；（二）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質极大地提高；（三）全民教育普及并且大大提高等三个条件外，还必须逐步消灭在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別、城乡差別、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別，以及反映这些差別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权的残余。因此，批判資產階級法权思想，在实际生活的各方面消除資產階級法权观念的残余，对进一步提高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設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資產階級法权是資本主义制度的集中反映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意志的表现

法权或法权观念，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份，是一定的社会經濟基础的反映。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学批判”的“序言”中曾經指出：“法权关系，也如国家形态一样，不可能从它們本身来理解，也不可能从所謂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过程来理解；恰恰相反，它們是根源于物質生活关系之中”。抽象的法权和法权观念是没有的，法权这一

上层建筑是一定經濟基础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积极为巩固这种基础服务。也就是說，法权和法权观念总是有着鮮明的階級性。

資產階級为了掩飾資產階級法权的反动本質，总是把它說成是超階級的，永恒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例如，他們宣传“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个人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等等，說来是那么冠冕堂皇。但是，在以生产資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資本主义社会里，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無論經濟上、政治上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在实际上都是不平等的，所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實質上是用来掩盖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的不平等；所謂“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實質上是用来保障資產階級的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为了保障資產階級的統治，資本主义社会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法权观念，有些取得了法律的形式，有些則以“不成文法”的道德观念表现出来。但是不論怎样，資產階級法权总是資產階級的階級意志的表现，是資本主义制度的集中反映。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加以揭露說：“你們（指資產階級——笔者）的观念根本就是資產階級生产关系和資產階級所有制关系底产物，正好象你們的法权不过是被推崇为法律了的你們这个階級的意志，而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由你們这个階級的物質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和資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一样，資產階級法权也是一种历史现象。資產階級法权不可能先于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产生，但是当資本主义所有制被废除以后，資產階級法权的残余一时却还不能完全消灭。例如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方面的等級制度、不平等的分配制度等都还存在，至于資產階級法权思想的影响就要更長远得多。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虽已废除資本主义所有制，但是資產階級

法权的残余还存在，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局面出现以后，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进一步表现出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狭隘性、反动性以及它和现实生活的尖锐矛盾，同时也使我们具有更充分的物质条件，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

## 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特征

资产阶级法权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在进行民主革命时，曾经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美丽口号来动员劳动人民进行反封建特权的斗争，并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竭力说成是“全民革命”。但是当资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它就夺取了全部革命果实，把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把劳动人民踩在自己的脚下，成为自己剥削和奴役的对象。资产阶级把所有这些阶级利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就形成资产阶级法权。有些虽然没有或者不方便用法律形式来规定的，例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经济上政治上的不平等，则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来起着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

资产阶级法权中最根本的东西，或者说，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就是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是全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也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出发点，离开了这，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社会了。因此资产阶级法权总是从各方面去反映资产阶级的这一根本利益，并千方百计为巩固资产阶级这一根本利益服务。

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虽然是承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表现，却要复杂丰富得多，其中最主要的，我以为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间一系列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例如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掌握了全部国家权力，甚至通过法律规定具有一定的财产和教育程度，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而剥夺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利，造成政治上的实际的不平等；资产阶级掌握着统治权利，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则只有被统治的“权利”。在经济上，资产阶级拥有主要的生产资料 and 大量财富，而无产阶级则一无所有；财产私有的法权，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资产阶级法权中的财产继承权、“等价交换”、劳动力商品化等，都是强化了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在文化教育同

方面，资产阶级及其子女垄断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则被剥夺或限制了这种权利，造成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体力劳动者报酬低，脑力劳动者报酬高。由于资产阶级主要从发展城市工业起家，落后的农村和农业生产往往反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超经济剥削，这就形成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工业与农业的差别，亦即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不平等。此外，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还广泛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例如有些戏院、公园只准“高贵”的人进去玩，“穷人与狗不得进入”；有些学校是专为富人子弟而设；在公共汽车、火车或轮船上也分等级，这就自然而然把富人和穷人划分得一清二楚；在两性关系上以男权为中心，妇女被当作男性的附属物，甚至被当作商品。到处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比阔气，比地位，等等。总之，资产阶级法权贯穿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各方面，到处表现着“资本统治一切”的烙印，“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与冷酷的‘现金交易’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关系了”①

有些人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特征是“自由、平等”，而不是等级制度。并认为等级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特征，和封建社会比较起来，资本主义社会仿佛要“自由、平等”得多。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不错，资产阶级当年曾经打着“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旗帜向封建社会开战。这是因为，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特权很多，关卡林立，妨碍着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和“个性发展”。但是，一旦当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之间又出现了新的不平等。资产阶级的法权就是要把这种不平等通过法律形式或公认的观念肯定起来。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继续高唱“平等、自由”的滥调，这实际上不过是用来掩饰它的等级制度和阶级统治关系吧了。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在现在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内，自由是指的贸易自由，买卖自由”。实际上也就是资本自由，没有资本的人是沒有自由的，这不是最严酷的等级制度吗？这不是最大的不平等吗？如果说，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是以宗法制作基础，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制度则是以资本的私人占有作基础，但是它们在平等这一点上总是一致的。所不

①见“共产党宣言”

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披上了一层“自由、平等”的外衣，变得更富于虚伪性和欺骗性罢了。

## 资产阶级的法权必须批判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已经基本被消灭以后，资产阶级法权早已变得支离破碎了，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又进一步被摧毁。但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观念及其残余影响还存在，必须进一步彻底加以批判。

首先，我们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观念。财产私有本来是阶级社会的共同基础，但是资产阶级法权把财产的私有神圣化了，它们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全部阶级社会关于财产私有的传统之大成，以商品生产和商品占有形式形成财产私有的最后与最完备的表现。资产阶级法权还强调财产私有是人类历史和社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是最神圣最合乎公理正义的原则的。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也就是要消灭社会上一小部分人占有财产对另一部分人进行剥削的现象。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在取得所有制的彻底改变，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后，还必须进一步彻底批判反映这种所有制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权观念，树立社会财富是社会劳动所创造，必须归全社会所有，任何人不得据而私之的共产主义观念。自然，我们在这里必须具体区别“财产”的含义。有人怀疑，消灭财产私有就是要“一切归公”，个人连生活资料也不能保有了。这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恶意的中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是剥夺利用这种占有以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而且肯定地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物质生产的极度丰富，个人所占有的社会产品会愈来愈多，从而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

其次，我们必须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表现——等级制度，即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实际的不平等。资产阶级社会在政治上最大的不平等，就是资产阶级掌握着统治权，而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置于被统治的地位。他们把资产阶级民主美化为“全民政治”、“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是实际上，不仅资产阶级直接控制着全部国家机器，垄断资本的董事会成为国家的真正决策机关；而且，资产阶级各级行政机关的负责

人员，也为资产阶级及其子弟所垄断，“亦官亦商”，财产成为新的“世袭”条件。谁会相信“穷苦的牧童也可以当选美国总统”的鬼话呢？此外，资产阶级法权还表现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可以任意强迫老百姓做事，任意拘押、捕打人民，并多方限制和剥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其他民主权利，在整个政治生活中，造成实际的不平等和森严的等级观念。所谓“自由、平等、人权”，不过是资产阶级反动法权的遮盖布罢了。在经济关系上，资产阶级法权最富于欺骗性的，就是在“自由贸易”、“等价交换”幌子下的实际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价值仅仅在于他是可以创造利润的劳动力，而劳动力既然成为商品，它就同其他商品一样，可以“自由交易”；可以“等价交换”。从而，“自由交易”，“做多少事，给多少钱”、“按劳取值”，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的特征。表面上看来，“自由交易”，“按劳取值”、“做多少事，给多少钱”是十分公平合理的，资产阶级也正是利用这种表象来大肆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但是，我们知道，既然资产阶级掌握着社会的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却一无所有，他们要不致于饿死，就不能不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卖给资本家。买卖劳动力上的“自由交易”，“等价交换”，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在这种假象后面隐藏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支配，工人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所取得的“值”，决不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价值，而仅仅是维持工人及其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却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这样，“等价交换”，“按劳取值”就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的剥削和他们之间惊人的不平等。此外，由于劳动者本身已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的人劳动力强些，有的人劳动力弱些；有的人孩子多，有的人孩子少，但是资本家决不会在强和弱的劳动力之间划上等号，也决不会因为你子女多而多给工资，这也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实际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按劳取值”的反面就是“按值付劳”，或“给多少钱，做多少事”，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态度，从资本主义的法权观念来看，也是天公地道的。

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摧毁了资本主义所有制，从而也就否定了劳动力商品化、人的价值只在于他能够创造利润的资产阶级法权。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受到本身物质生产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立即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最高原

則，因此還只能運用資本主義社會的“按勞取值”的分配制度為社會主義服務。但是，社會主義的“按勞取值”和資本主義的“按勞取值”有着本質上的區別，在社會主義下，勞動力已不再是商品，工資已不再是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的表現了；勞動者所得的勞動報酬，是以他為社會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來衡量的。勞動者所取得的“值”，也就更加接近於他本身所創造的價值（自然，這裡還要扣除維持和擴大再生產即公共積累和其他社會義務等部分）。社會主義國家還通過公共福利措施，特殊困難的照顧等方面，來保證最廣大勞動群眾的物質生活。資產階級所以吹噓的“平等”，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真正得到逐步實現。同時，由於社會主義制度下階級對立的消滅，工農業生產的全面發展和徹底的技术革命，勞動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這就為消滅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城鄉差別和工農業間的差別提供了前提條件，從而對資產階級法權的主要內容予以徹底的批判。

社會主義徹底批判了資產階級法權的等級制，而真正實現着人類多少世紀以來所夢想的平等。但是，有人誤解或者惡意歪曲說，社會主義就是要求社會成員的需要和個人生活絕對平均，例如，吃一樣的東西、穿同樣的衣服，在生活的各方面都是絕對平等的、一律的，等等。這只能是小資產階級絕對平均主義的反動思想。“馬克思主義所了解的平等，並不是個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階級的消滅。這就是說：（甲）在推翻和剝奪資本家以後，一切勞動者都平等地擺脫剝削而得到解放；（乙）在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以後，對於大家都平等地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丙）大家都按各人能力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按勞取酬的平均權利（社會主義社會）；（丁）大家都按各人能力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各取所需的平等權利（共產主義社會）。同時，馬克思主義認為，無論在社會主義時期或共產主義時期，各人的口味和需要在質量上或在數量上都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彼此一樣，大家平等的”。①我們在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等級制度的同時，必須批判小資產階級的和農業社會主義的絕對平均主義和把個人需要一律“輾平”的反動思想，確立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的平等觀。

## 徹底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加速 向共產主義過渡

我國由於經濟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已經廢除了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徹底摧毀了資產階級法權的基礎。又由於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有力地批判了資產階級的法權觀念。隨着全民整風運動的深入特別是全面大躍進以來群眾思想的解放和共產主義思想風格的高揚，我們正在從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思想領域徹底清算着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影響。

經過偉大的整風運動，我們的國家機關和全體幹部大大克服了“三風”、“五氣”。各級領導幹部不是靠威風、靠官架子，而是靠為人民服務的無限忠誠，靠說服教育來進行工作。黨中央還作出幹部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在工廠企業中實行“兩參一改”（幹部參加勞動、職工參加管理工作、改革經營管理制度），使各級幹部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在群眾中出現，與群眾打成一片；在人民的軍隊中，本來富有民主的傳統，現在又實行軍官定期到連隊當兵的制度，進一步密切了官兵關係。所有這些，不僅在實際工作中，而且也在社會風氣的影響上，大大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的等級制觀念。為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等級制度，這些做法都必須堅持和發展下去。

我們黨提出的教育和勞動生產相結合，工廠、農業社辦學校，學校辦工廠、農場，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的方針，已經在實踐中表現出無限的生命力。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消除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的原理在實踐中的創造性發展。偉大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潮的到來，實行“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全面躍進，政社結合，大搞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等等，大大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人民公社在短短的實踐中已經證明它是我國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好的組織形式，也是將來實現共產主義的最好的基層組織形式。人民公社化是消滅城鄉差別、工農業差別的最好途徑。所有這些，都將進一步徹底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等級制度。

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問題中，目前引起較多爭論的是關於“按勞取酬”和供給制的問題。我們知道，“按勞取酬”的原則按其性質說來，是資產階級法權的一種。我們在全國解放後取消了原來在解放區實行的供給制，由1952年起逐步改為工資制，即以按勞付酬為標準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工資制。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倒退”、“偏差”，是“對資產階級法權的讓步”，是把資產階級法權的

①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第一〇七頁。

等級制甚至是封建的等級制“系統化、制度化”了。我認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我們知道，在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的干部的供給制，是在物質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为了保証人們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的一种战时共产主义性質的分配制度。实行这种分配制度，不仅保証了解放区軍需民食，支援革命战争的胜利，而且发扬了共产主义思想，培养了革命队伍艰苦朴素的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加强了內部团結。但是，就是这样一种分配制度，也不是和不应该是完全平等、绝对平均的。全国解放后我們取得了全国的政权，不仅經濟条件起了根本变化，由于党采取的统一战綫政策，階級关系、革命陣营内部的情况，也要比在革命战争时期复杂得多，同时我們还从国民党反动派接收过来全部旧摊子，多数企业也还为資本家私人所有，为了稳定市场，加速恢复国民經济，順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国家采取“按劳取酬”的工資制是完全正确的，决不是什么“偏差”和“倒退”。何况，我們的工資制是社会主义性質的“按劳取酬”，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說的，是一种低薪制，目的是三个人的飯五个人吃，使就业的人数更多，社会生产发展更快。这實質上是以新的工資制的形式，来保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人們之間为当前物質生产的具体条件所容許的平等。我們應該从實質上去分析工資制和供給制的内容，即从它們对消除資產階級法权的等級制度所起的实际作用来进行判断，而不應該單純从形式上去看問題。难道我們能够怀疑，解放以来，广大工农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分子的特权受到各种限制，全国人民的生活处于一种比較接近的水平的基本事实嗎？

今天，随着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首先是全国粮食产量的成倍地增加，广大工农群众共产主义思想大大发扬，因此在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的时候，我們便有可能实行“吃飯不要錢”等等半供給制半工資制的分配制度，在工厂企业中根据职工的要求取消計件工資制。这是帶有共产主义萌芽性質的，是我国分配制度的新发展。但是，就是这样，“按劳取酬”原則也沒有完全消失它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建設的不断發展，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們的分配制度也就將逐步由“按劳取酬”过渡到“各取所需”。这是一个由漸变而发展为突变的过程，如果离开具体条件，要求突然来个“飞跃”，只能是一种偏激和幻想。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中，对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曾經写道：

“我們这里所說的不是已經在自身基础上發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資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經濟、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还保留其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每一个別的生产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后，从社会中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会的一切”。但是，我們肯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不可避免地残存着資產階級法权，并不等于完全肯定这种法权的合理性和永恒性。相反地，我們完全看清了它的缺点。馬克思接着就說，“这些缺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在它經過長期的育产痛苦以后刚刚从資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法权永不能超过社会經濟制度以及由此經濟制度所决定的社会文化發展程度”；只有“共产主义社会高級阶段上，当那奴役人們、迫使其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后；……当劳动已經不單單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为乐生的第一要素时；当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在各方面的发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財富源泉都尽量涌现出来时，——只有那时，才可把資產階級式的法权的狹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会就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我們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为进一步彻底肃清資產階級法权残余及其观念而斗争。这就是要彻底肃清作为資產階級法权基石的生产資料的私有制；要通过全民大煉鋼鐵、大搞生产，將資產階級分子及其家屬和一切寄生階層分子，都組織到生产劳动中去，做到凡是有劳动力的人都参加生产劳动，实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則；要繼續巩固和扩大整风运动的成果，坚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职工参加管理工作的制度，使各級领导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从根本上改变領導与群众的关系。要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生活集体化、組織軍事化、生产战斗化，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大破資產階級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发扬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拼命工作、不計報酬”的崇高风格，繼續贯彻执行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結合的方針，消除体力劳动与腦力劳动的差別；消除城乡之間、工农业之間的差別。执行“半供給制”加“半工資制”的分配制度，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广大群众共产主义覺悟的不断提高，逐步过渡到“全供給制”。这样，共产主义因素逐步增加，資產階級法权的残余逐步被削弱以至完全消灭，我国也就由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 对按劳分配的認識

雷 强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在經濟战綫上取得基本胜利，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使得生产关系起了深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問題基本上解决了；经历了反右和全民性整风的伟大胜利，驅除了三风五气，密切了干部和群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在生产中人与人处于平等的地位以及相互間同志般互助合作的关系更趋于完善。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这种相互关系的改进推动了所有制和分配問題的进一步解决。所以說，在所有制問題基本解决了以后，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在生产关系中占了愈来愈重要的地位。这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对于馬列主义生产关系理論的丰富和重大发展。目前工农业大跃进不仅說明了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影响，并且說明了人与人在生产中相互关系的改变，直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这一方面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的另一方面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另外生产力的发展也直接推动分配关系的发展。

分配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个重要問題。分配問題体现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間的关系，具体牵涉到不同性質的劳动者和不同部門工作者之間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民收入的分配归結为三个問題：一、积累基金与消費基金的分配比例問題；二、积累基金的分配問題；三、消費基金的分配問題，其中又分社会消費基金和个人消費基金。三方面是密切联系，互相影响的。如果分配关系处理得正确，必定会刺激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必定会加强人民內部团结，有利于克服资产階級思想和树立共产主义思想，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調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基本要点之一。所以正确認識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則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建設和向共产主义过渡中的作用，根据

这一原則正确处理个人消費基金的分配問題是有重大意义的。这里只想着重談談有关个人消費基金的分配問題。

分配是由生产所决定的，其中又直接取决于生产資料所有制的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資料公有使得劳动成果为劳动人民所享有。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未达到能够保証有极其丰足的消費品来完全滿足人們需要的程度；人們还未具备高度的共产主义道德和风格，劳动还未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們的文化技术和科学知識还没有普遍的提高，还存在体力劳动与腦力劳动的重大差别。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在根本上廢除了旧的分配制度后，还不可能立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而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則。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分配个人消費基金的基本原則。它建立在消灭生产資料私有制和人剝削人的关系上，比起那使极少数垄断資本家霸占絕大部分国民收入，广大劳动人民陷入贫困境地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比諸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則來說，由于它还是按劳分配，沒有劳动力的老弱幼小，就不能按需要領取社会产品，他們只能依賴其家庭中有劳动力的人养活，因此使社会上各个人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它还不是理想的。按劳分配并不是唯一最好的分配原則，我們的理想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則，按劳分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說是一种过渡性的分配原則。为要創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由“各取所需”来代替“按劳分配”，目前就需要正确認識和正确运用按劳分配原則。

毛主席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說和分配問題的理論对于我們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問題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毛主席指示我們分配关系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之一，必須运用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方式来解决，必須从群众的大多数出发，走群众路綫，用說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在运用按劳分配原則上，必須要从六亿人口出发，从我国一穷二白需要



勤儉建國出發，貫徹“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必須着重加強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用共產主義精神來對待按勞分配原則。這是馬列主義關於分配理論的新發展。

黨中央委員會向八大二次會議所作的工作報告中，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在運用按勞分配原則上提出了一些具體政策。文件中說：“在工農生活水平、城鄉生活水平之間，在不同工種、不同技術等級、不同地區的工資之間，一定的合理差別是必要的，但是應該避免不合理的過大距離。縣和縣以下企業，對於勞動工資和勞動福利的問題，應當作出適合農村和半農村環境的規定，而不要搬用大城市大企業中現在實行的那一套辦法”<sup>①</sup>。這些指示對於我們正確認識和運用按勞分配原則是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分配唯一的準則是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利於人民內部的團結。今天在我國人口眾多，生產力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勞動者的報酬是不高的，並且只能是逐步提高，這是既能照顧到生產建設的發展又能照顧到勞動者生活水平提高的辦法。

由於工人和農民是我國的兩個基本階級，人數最多，而工農聯盟又是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因此在工農業勞動者之間，正確運用按勞分配原則是一個有重大政治和經濟意義的問題。我們在不同種類、級別的勞動者之間，特別是工農業勞動者之間，保持勞動報酬一定的合理差別，但又注意到不使這種差別過於懸殊，這也是考慮到我國人口眾多，其中農民又占大多數，工農業勞動者之間勞動報酬的差別過大是不利於團結和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的。所以不僅要從政治上，還必須從經濟上來鞏固工農聯盟。在解決分配問題的方法上應該是走群眾路線的民主方法，把政策交給群眾討論，結合當地條件和按勞分配原則，通過鳴放辯論提高認識來解決，並且自始至終貫徹政治思想教育，運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來解決。目前人民公社的成立，是在分配問題上迅速縮小工農業勞動者生活差別以至逐步地創造條件來消滅這種差別的最好途徑，也是現階段更好的貫徹“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方針的形式。公社消費基金的分配在目前有一部分還是按勞分配性質的，但既然公社是工農商學兵結合在一起，便於全民動手盡量迅速發展工農業，促進生產的全面發展，提高整個社會生產力；而且就在人民公社內部，也有著工業、農業、商業和文教工作各種勞動者。這樣，一方面在社會生產力全面提高的基礎上，另一方面又在公社內部統一計算各種勞動報酬，就更便於調節各種勞動者之

間的關係，就能夠服從生產發展的需要更好的運用按勞分配原則，適當縮小各種勞動者的生活差別。公社工資是由群眾討論評定的，也貫徹了走群眾路線的民主方法。

## 二

一些人在右派瘋狂進攻時，容易受到右派分子蒙蔽接受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其中原因之一是因為這些人本身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追求個人名位和物質享受。喜歡和別人的比工資、比待遇、比享受，而不是比工作、比干劲、比貢獻，並且總是比上而不是比下，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時，就特別容易接受絕對平均主義思想。有些人片面強調按勞分配原則，忽略在運用這個原則的同時，進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因而滋長了“按酬付勞的”資產階級僱傭觀點。因此在分配問題上要不斷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作鬥爭，加強共產主義教育，用共產主義思想來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在今天更不應強調按勞分配的作用。馬克思在哥達綱領中第一次唯物辯證地論證了按勞分配就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分配原則，但是它在原則上仍舊是“資產階級式法權”，並且指出了按勞分配原則有它平等的一面和不平等的一面。這是由於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是從資本主義母胎中生產出來的，還帶有資本主義的疤痕<sup>②</sup>。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論述馬克思這一光輝的原理時，說到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中“資產階級法權”還沒有完全取消，只是局部取消，即是將生產資料私有變為公有，在這個限度內取消了“資產階級式法權”。但是在個人消費基金的分配方面，由於按勞動分配是社會各成員間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在這方面還存在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

按勞分配原則有其平等的一面，那就是基於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了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階級剝削關係，勞動者在生產資料公有和勞動權利上是一律平等的，消滅了不勞而獲，勞動者平等地以勞動來計量他們對社會的貢獻和分配消費品，等量勞動獲得等量的社會產品。這是剝削階級社會所不能有的平等。但是按勞分配原則比諸共產主義按

<sup>①</sup>黨中央委員會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工作報告  
第三部分

<sup>②</sup>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卷Ⅱ第21——22頁

需要来分配消費品的原則，还有其不平等的一面。因为消費品是按劳动来分配的，而不同的各个劳动者劳动能力和家庭人口是不相同的，所以每一个劳动者的真正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也是不相同的。按劳分配实际上是將同一的标准用于各不相同的人身上，因而是<sup>不</sup>平等的。为什么馬克思和列宁还把按劳分配称为资产階級式的法权呢？我們知道，馬克思主义認為法权就是被提升为法律的統治階級的意志，是为了有利于統治階級国家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所强制执行的行为、規則和标准。按劳分配要求按每个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質量来分配消費品。劳动者所获得的消費品与他对社会所提供的劳动相适应，这就与商品等价交换相类似。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經濟发展到最高度的社会，在资本主义下，商品生产具有統治的、普遍的性質，商品交换是“资产階級社会里最簡單、最普遍、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一切經濟关系都在商品等价交换这一虛假的形式下实现着，因此，等价交换便成为资产階級社会經濟生活的标准，并被提升为资产階級法权。既然按劳分配还与商品等价交换相类似，在形式上表现虛偽的平等，那么它就是在分配問題上的“资产階級式法权”。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资产階級式法权”才被完全克服。按劳分配原則虽然是共产主义初級阶段分配个人消費品的基本原则，它对发展生产虽然起过重大作用，但它还不是按需要来分配个人消費品，这應該認為是一种缺陷。正因为这样，按劳分配实际上会导致生活水平的差异，如果对按劳分配缺乏認識和处理不好，还会产生及助長资产階級思想。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如果不能正确运用按劳分配原則，会造成一些不合理现象，使不平等的差別更加扩大，使一部分人的收入和生活条件与一般工农群众相悬殊（例如獎金过多，作家稿酬过高，艺术家收入过多等），在生活上脱离群众，逐漸产生貪图享乐，怕艰苦和揮霍浪費的思想作风。这种与一般工农群众生活水平过分悬殊的生活条件本身就会产生资产階級思想。第二，这种现象的存在也会使少数人滋長少劳多获以致不劳而获的资产階級思想。而且这种消費資料分配上的不平等如果差別过大，会使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和劳动报酬的目的和意义产生錯誤認識。本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是英勇豪迈的，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建設共产主义，劳动报酬的作用是为了使劳动者适当地从物質利益上关心生产，提高劳动者的技术和文化水平，提高劳动生

产率，促进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报酬差別过大，容易使人从报酬大小来衡量劳动，如果从个人主义出发来对待按劳分配，必然就会認為劳动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生活享受，斤斤計較劳动报酬，不从“各尽所能”着眼，必然滋長“为酬而劳”“看酬付劳”的雇佣观点和少劳多获而至不劳而获的资产階級思想。正因此，所以說按劳分配还不能摆脱在分配关系上的“资产階級法权”残余的影响，在分配方面的不平等的一面就还会有可能滋長资产階級思想意識。

在按劳分配問題上，級別过大过多所形成的一套“級別制度”和計件工資制会妨碍生产关系中与人人在生产中平等友爱互助合作的同志式关系的密切和发展，而又直接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今天，整风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后，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人們的思想意識，精神面貌起着深刻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对經濟基础的作用使得生产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起了变化。例如上海許多工厂工人在生产大跃进的激流中，以共产主义的自觉精神废弃了阻碍生产跃进的計件工資制度，使生产又出现了一个嶄新的局面。他們認為生产一倍、十倍、几十倍的增加，是全国工农业跃进的結果；大搞技术革命，劳动生产率成倍的提高，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如果計件工人按比例拿獎金，那就太不合理了。他們提出：劳动是为了建設社会主义不是为了鈔票。要政治挂帅不要鈔票挂帅。生产的发展，人們的共产主义精神面貌的改变使得原来的分配形式不相适应。正如有些工人認為：过去計件工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起了一定作用，但問題很多，例如有人在工作时揀精揀肥，揀定額松的活做；因为是計件制，对劳动紀律也不放在眼內；在实际工作中很少交流技术經驗，更談不上化時間进行試驗来革新技术；計件工資有时也影响了工人与工人之間、計件工人与計时工人之間、工人与干部之間的团結。事实証明。这些厂的領導一接受了群众的要求，领导和依靠群众通过鳴放辯論，对工資制度加以改革后，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和革命干劲，进一步發揮起来，生产力出现了新的飞跃①。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們，在一切工作中，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在經濟工作中，必須要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对待分配問題。在运用按劳分配原則时就必須不断和资产階級思想作斗争，既然按劳分配有“资产階級式法权”的不平等的一面，处理不好

①人民日报1958.9.25第五版

会滋長資產階級思想，而在现阶段，在分配原則上基本上还是按劳分配的，那末在分配問題上強調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更为重要。必須使广大群众都能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对待工資問題和分配問題，这是毛主席关于政治領導經濟，政治工作与經濟工作相結合的指示在分配問題上的体现。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劳动并不是为了报酬。用毛主席的話來說就是“拼命干工作，不計較报酬”，也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风格。按劳取酬是用一定的物質利益来刺激人們更好地劳动，这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的一种办法，但决不是唯一的办法。最重要的和最能推动劳动者为社会主义进行忘我地英勇地劳动的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理想。我們應該从精神方面和物質方面，积极創造条件来促使按劳分配这一原則的消逝，以便能早日实现各取所需的原则。今天我国人民群众在党的領導和教育下，共产主义的道德精神迅速成長着。共产主义已經是行將到来的前景。我国正在向建成社会主义，积极准备条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时期。上层建筑对基础起着积极的作用，必須大大地迅速发扬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道德精神，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用来彻底清除私有制的残余，彻底清除資產階級思想，大破資產階級法权思想。在分配制度上，應該逐步实行和扩大有共产主义因素的分配制度，以便从經濟上逐步削弱按劳取酬，逐步完全过渡到各取所需。由于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社会产品的日益丰富，我們完全有条件这样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两个截然分开的阶段，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也包含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建設阶段，隨着生产的发展，劳动人民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提高，在分配問題上和“按劳分配”原則一起可以出现和逐步增加“各取所需”的成分。目前人民公社在分配中开始实行一些帶有共产主义分配关系因素的供給制，有的实行粮食供給制，有的实行伙食供給制，經濟条件較优越的公社正在試行生活基本需要供給制，确定供給标准，实行“七包”“十包”，例如“十包”指包吃、穿、

生养、死葬、結婚費用、教、住、烤火費、理髮、看戏看电影等等。①这种按需要分配的定量供給制虽然不完全等于“各取所需”，但包含着共产主义的分配因素在內。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員思想觉悟的提高，定量供給制就会变为不定量的供給制，并且供給制的比重在分配中的不断增加，共产主义的分配因素也就逐步增加。在分配問題上供給制成分的增加和充裕將是逐步縮小以至根本上消除各种劳动者生活差別的具体途径。將大大提高社員的生活水平，也是逐步地創造条件，由“各取所需”代替“按劳分配”的具体途径。今天的供給制与过去的供給制虽然有所不同，例如过去的供給制是在生活資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的，而今天却是在生活資料比較充裕的条件下实行的，但是它們的共产主义性質和因素都是一样的。供給制根本不同于絕對平均主义。絕對平均主义是不問劳动而只問劳动报酬的絕對平均思想，它反对各尽所能，不論劳动的情况如何，不論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不相同，一律实行絕對的、毫无差別的平均分配消費品。它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反动的小資產階級幻想在經濟上的反映，对生产和革命斗争起了破坏的作用。毛主席指出：“它不但在资本主义沒有消灭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質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需要，决无所谓絕對的平均”。②“必須反对不問一切理由的絕對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③在当前条件下逐步恢复供給制这种帶有共产主义分配因素的分配制度，还会重新发扬过去实行供給制时上下、軍民的关系平等一致的共产主义精神和优秀传统，进一步培养人們的共产主义风格，改变人們的精神面貌和人与人之間的关系。

①紅旗1958年第4期第8頁吳芝圃：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

②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93頁

③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94頁。

# 論“三个并举”是毛澤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設理論的重大发展

卓 群

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毛澤东同志的伟大貢獻是他全面地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設中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并把这些矛盾的基本点概括为“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这条总路綫不但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全面大跃进，而且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設实践密切結合起来并进一步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里，我想着重研究一下“三个并举”的問題。由于毛澤东同志正确地处理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关系、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关系，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設的巨大动力，使中国社会主义經濟建設呈现了跃进的面貌，中国社会主义經濟建設的巨大速度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这种奇迹的出现难道是偶然的嗎？

## 一、“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重大意义

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呢？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訴我們，社会生产归結起来不外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两大部类，为了使社会生产不断扩大，就必须具备两大条件：第一，生产資料的生产必須优先增長；第二，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两个部类之間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所謂生产資料生产的优先增長，基本上就是一个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問題（我們說基本上，是因为重工业中也有生活資料部分），而生活資料这个部类，基本上就是一个农业和輕工业的問題（因为农业和輕工业中也有生产資料部分）。这是客观的經濟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毛澤东同志所提出来的“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正是这一客观經濟規律的反映。这个規律的理論實質是这样：生产資料的优先增長意味着重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的发

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制訂发展国民經济計划时，规定工业和农业間的比例，不仅要保証工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且要保証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具体說来，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大体是这样：农业要为工业部門提供粮食和原料（輕工业的原料），工业则为农业部門提供重工业产品（生产資料）和輕工业产品（生活資料），因此，它們之間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不正常就会影响到社会生产的发展。就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設实践看来，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原因是在強調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往往容易产生忽視工业和农业必須按比例发展的这一方面。拿苏联來說，它的社会主义建設发展的速度是很高的，但农业長期落后于工业，从1928年到1940年，工业增長了五倍半，但粮食只增長了百分之六十二；从1940年到1952年，苏联处在战争和战后恢复时期，在这时期工业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二十，粮食只增長了百分之十八。特别是在1951年到1954年这个时期，谷物和技术作物的产量几乎没有增加。在1953年，当谷物的需要量比革命前大大增加的时候，谷物播种面积却几乎跟1913年一样。在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情况。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过程中，东北地区对于农业也曾重視不够。辽宁省副省长褚鳳岐同志在总结辽宁工农业生产时会这样說过：“我們辽宁省几年来在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是有很大成績的。但是和我省工业生产发展、城市人口增長的速度来比較，則是很不相适应的。我省1952年的城市人口是四百零三万人，1957年增加到八百四十万人，五年增長了一倍以上。而在农业生产方面，粮食产量1957年比1952年仅增長21%；生猪头数仅增長15%；蔬菜播种面积五年来增長86%。农业生产的发展显然是赶不上形势了。这样就使得原来就供不应求的局面更加紧张，逆差越来越大。近年来，每年都需要国家供应一百二十万吨左右粮食，和从兄弟省份調进二万吨左右猪肉和八万吨左右蔬菜，才能勉强过活。这样做，

不仅国家增加很多負担和造成很大損失，而且也影响到对消費者的正常供应，影响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影响工业高速度的发展。”毛主席总结了这些經驗，他反复强调了工农业必須同时并举，在十大关系中提到了这个問題，党章序言中提到了这个問題，“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決議也提到了这个問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又特別闡述了这个問題。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針，其重要意义还决不止于此，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因此在工农业并举这个問題上还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推动工业向前发展。关于这一点，早在二中全会決議中就这样說过：“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經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來說，大約是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后来校正为百分之十七——作者），农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結果，这是旧中国表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經济形态，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內及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長的时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发点。”怎样来理解这个問題呢？这必須进一步探討中国的特点。中国有些什么特点呢？概括起来，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耕地較少、工业落后、农产品不能滿足需要。由于这些特点，就集中地表现为两大問題：一个是农业的比重大，农业在国民經济中有决定的作用；一个是农产品在滿足人民生活需要上來說，并不富裕。从后一个問題來說，中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国，在解放以前，一方面有广大的劳动人民瀕于飢寒交迫的境地，一方面却还要从外国輸入粮食和棉花、花紗和棉布。解放以后，在前一些时候，粮食、棉花的产量虽然不断增长，但远远赶不上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所以吃和穿的問題还是相当紧张。从前一个問題來說，只有农业发展了，其他的經济事业才能得到相应的发展。农业的这种特殊地位，表现在农业和財政的关系上，农业丰收，財政就丰收；表现在农业和輕工业的关系上，农业丰收，輕工业就得到发展，反之就要受到影响；表现在农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上，农业丰收，重工业就发展得快，反之就要慢一些。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国民經济变化的情况，完全反映了这个問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間，我国財政收入中，农业稅、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稅或上繳利潤等直接、間接同农产品有关的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四至五十八。而且財政收入的增减同农业的丰歉息息相关，比如1952年、1955年农业丰收，1953年財政收入就增長了24%，1956年增長了15.8%。1954

年、1956年歉收，1955年只增長3.7%，1957年只增長1.9%。农业同工业的关系也是这样，农业发展快，工业的发展就快，反之就慢。如1952年、1955年农业丰收，1953年和1956年工业总产值就分別增長了30.2%和28.2%；1954年、1956年农业歉收，1955年和1957年工业总产值就只增加5.6%和4%左右。原因在於我国輕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約有80%靠农业，而我国輕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还占50%左右。在农业歉收的年份，許多需用农业原料的工业部門都不能正常开工。如1955年上半年，全国地方工业中，棉紗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75%，棉布及食用植物油只有62%，面粉只有56%，卷烟及大米只有24%。在重工业方面，农业丰收了，基本建設的投資就可以增多，一方面是加速了重工业的建設，另一方面也为原有的重工业打开了市场。农业丰收以后，农村对重工业提出了要求，当前的形势就是重工业产品不能滿足农村的需要。就农业大跃进以前的情况来看，农村也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重工业产品供应农村的比重是：生鉄占12%以上，煤占50%以上，煤油占80%以上，木材占30%左右，化学肥料和农葯，几乎全部供应农村，此外还有大量的农业、水利等机械。反过来說，这也是重工业对农业的一种支持，將來实现农业机械化，更非重工业支持不可。

根据以上两种情况看来，根本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农业，理由是这样：第一，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迅速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因为农业发展了，輕工业的原料就增加了，这样就可以通过农业和輕工业的发展增加財政收入，积累更多的資金。第二，在我国六亿多人口中，农业人口有五亿五千万，占总人口的85%以上，占全国生产人口的絕大多数，我們国家的富裕不富裕，就看六亿人口的劳动生产率高不高，假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仅仅是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那还是无济于事的。比如粮食問題要是不解决，經济作物的問題不解决，这就会直接影响到人民的吃穿問題，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无法提高。毛主席充分認識到这个問題，所以首先用全党的主要精力来抓农业，首先抓了农业合作化，其次又抓农业发展綱要40条，这样就取得了今年的农业大丰收，粮食問題已基本过关。不但这样，毛主席还总结出了一套农业生产的基本規律，即水利、土壤、肥料、良种、密植、防治病虫害、田間管理和工具改革，我們在掌握这些規律的基础上，我們根据对农产品的需要要生产多少就有多少，把农业科学提高到世界上最先

進的水平。由於糧食問題的基本過關，使我們有條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們的人民公社，絕大多數都實行糧食免費供應制。由於糧食問題的基本過關，也就可以使我們騰出一隻手來，大抓工業并把生產的重點轉到工業方面來，大大地促進工業的發展。我們的鋼鐵工業，今年就可以超過日本，明年就可以超過英國，這不就是大力發展農業所產生的顯著效果嗎？從這個意義來說，毛主席所提出來的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還不止是經濟規律的一般運用，而是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的一種創造性的發展。因為這裡所說的優先發展重工業，不只是一般擴大再生產的問題，而是要變農業國為工業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這裡所說的大力發展農業，也不是一般與工業相適應的問題，而是要通過發展農業來推動工業化的迅速實現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就說明了工業和農業的關係不但是互相適應的，而且還是互相促進、互相推動的。所以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乃是毛澤東同志又一次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光輝典範。現在看起來，工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社會生產發展的基本動力，沒有這一根本方針的指導，我國工農業生產的突飛猛晉是不可想象的。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就促進了生產關係的變化，人民公社運動的到來，也是和這個方針分不開的。

## 二、“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业同時並舉”开辟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道路

在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相互關係上，我們過去的理解也是片面的。我們一想到搞社會主義就必須搞工業，而搞工業又必搞大型企業，以為只有大企業才合乎社會主義的要求。既然要搞大型企業，那就只有中央才能舉辦。在這個思想指導之下，我們在實際上是忽視了地方工業和中小型企業的作用。忽視地方工業和中小型企業，實際上是忽視群眾路線問題，是缺乏辯證觀點的問題。忽視地方工業和中小型企業的結果就是少數人辦工業，一條腿走路。這樣就會大大影響工業化的

速度，影響全國人民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自從毛主席提出了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业同時並舉的方針以後，便正確地解決了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的相互關係問題，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相互關係問題，這樣就掀起了一个全党全民辦工業的高潮。在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問題上，就當前的情況來說，基本上是一個發展地方工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問題，因為中央工業和大型工業問題是已經解決了的。因此我們在這裡只着重分析一下發展地方工業和中小型工業的作用問題。自從加強發展地方工業和中小型企业以來，真是立竿見影，效果立見。中國是一個大國，一個省、一個專區、甚至於一個縣，都相當於一些中小型國家，因此發展地方工業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現在不但中央要建立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就是一個協作區、一個省也要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這樣就大大地提高了地方辦工業的積極性。至於中小型工業，那實質上是要發動廣大農民辦工業，因為這些工業必然遍布於廣大的農村中。今年上半年全國各地已建設成功三百三十多萬個工業生產單位，每個省、市、自治區都有上萬個企業投入生產，大多數的鄉、鎮和農業合作社都有自己的工業。不少地方的工業產值在今年就要超過農業的產值。人民公社運動開展以來，工業的發展尤其迅速，辦了很多冶煉鋼鐵、修造農具、造土化肥等等的工廠。特別是在冶煉鋼鐵方面，由於採取了小、土、群的方針，形成了勢如破竹、萬馬奔騰的局面。河南省社辦工廠就有三十七萬多個，它的生鐵最高日產量已達一百三十萬噸，全省已建成優秀的煉鐵爐四十四萬座，並組成二千一百十九個工廠。其他各省、市、自治區也在同樣的發展。廣東省鋼鐵工業基礎是較差的，現在也迎頭趕上，十一月一日，全省放出了日產87萬噸鐵的高產衛星，一舉完成今年的產鐵任務。全民大搞鋼鐵的運動已在全省蓬勃地開展起來，在這一天的內，產鐵一萬噸以上的縣分有26個，萬噸以上的人民公社29個，這就說明了依靠群眾和大、中、小並舉的優點。劉少奇同志特別分析了中小工業的優點，指出：“投資少，便於吸收分散的資金；建設時間短，投資效果發揮快；可以自己設計和供應設備，便於因陋就簡地利用當地各種現成的設備；分布廣，利於促進全國的工業化，促進全國技術力量的生長，促進各地區經濟的平衡發展；可以生產的品種多，改變品種也容易；接近原料市場，可以靈活地利用資源；節約運輸費用，供產銷也易於結合；易於按照工作

的多少而灵活地使用农村的劳动力和其他非专业的工人，因而有利于缩小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差别。”

从目前的形势看起来，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的一个巨大的创造，因为它不但解决了加速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的速度问题，而且还创造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道路。

先说关于加速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的问题。这在改变工业管理的体制和提倡中小型企业以后，各地发展工业的积极性大为高涨。现在的情况是不仅中央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各协作区、各省（自治区）也要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拿广东来说，到1960年就要基本实现工业化，也就是说要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使工业产值大于农业产值。如果大多数的省都和广东一样或者更大一些和快一些，那末，到1960年全国就可以基本实现工业化了。这当然就比只依靠中央办工业快得多了。在中小型企业方面也有同样的作用。比如，在冶金工业方面，今年全国将要建设起一万三千多座小型的和中型的炼铁高炉，它们每年的总生产能力达两千万吨，等于目前鞍山炼铁厂生产能力的四倍到五倍；今年全国将要建设起二百多座炼钢转炉，它们每年总的生产能力为一千多万吨，等于目前鞍山炼钢生产能力的两倍到三倍。从第三季度搞起大抓钢铁的群众运动以来，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过。如果我们只是建设象鞍山那样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我们就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花很少的代价，获得这样大的效果。不但冶金工业是这样，煤炭工业要大搞小煤窑，石油工业、化学肥料工业、炼铜炼铝工业，以及其他工业都是这样。今年一季度至三季度，单是农业社和人民公社办的工业单位就有六百万个。由此可见，只要我们实行大型工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特别是大搞中小型企业，就可以大大加速我国的工业化。至于农业机械化的问题，那就不在话下了。只要我们钢铁问题一解决，紧接而来的就是农业机械化问题，特别是在发展地方工业的前提下，农业机械化一定可以迅速地因地制宜地搞起来。

再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为什么说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工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是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了具体道路呢？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sup>①</sup>这应该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在剥削制度消

灭以后，剩下的就是一个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能够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那末，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就易如反掌了。可是工业同农业究竟如何结合呢？从一些经典著作上看，恩格斯似乎是寄托于大工业的平衡发展，而倍倍尔是寄托于城市向农村的移民。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也曾注意到这个问题，那就是斯大林所说的两种结合，他说：“什么是结合的新形式呢？从我们的经济政策方面来看，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就是说，除了城乡结合的旧形式以外，我们还需要结合的新形式。在旧形式下，工业主要是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花布、鞋子、一般纺织品等等），而在新形式下，工业将满足农民经济的生产需要（农业机器、拖拉机、优良种子、肥料等等）。”<sup>②</sup>除此以外，苏联还通过建立拖拉机站来为集体农庄服务，也算是工业和农业结合的一种形式。然而这些结合，只能算是一种低级形式，不能解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所提出来的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是工业同农业结合的最好形式，特别是在发展地方工业和中小型企业方面，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所谓地方工业和中小型企业，从它的体制来看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地方国营工业；一种社办工业。地方国营工业同农业的结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地方工业直接为农业服务，密切了工农的关系。陶鲁茄同志说：“县营联合工厂由于同全县农业社有密切联系，并且在供应、检修和创制新式农具、农业机械、制造肥料、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所以被全县农民誉为万宝全”<sup>③</sup>。第二，这些工业由于广布在农村中，可以实行亦工亦农的政策，以便按照工作的多少而灵活地使用农村劳动力和其他非专业工人。这些人进厂是工人，下田是农民，就有利于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至于社办工业，那就是农民自己办工业，其结合就更加紧密了。这里要特别指明的就是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是和中央工业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页）

<sup>②</sup>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51页）

<sup>③</sup> 陶鲁茄：论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新发展（新华半月刊1958年11期第37页）

工业同中小型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分不开的，因为在这个方针指导之下，农业社就开始办工业，但农业社在资金、人力、资源各方面都与发展工业不相适应，这样才有冲破农业社的束缚而兴起人民公社运动的客观必然性。当然，反过来说，人民公社出现以后，又会进一步促进工业与农业的结合。这种因果关系是一目了然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人民公社运动是不会这样迅速到来的。为什么说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是工农业结合的最好形式，同时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道路呢？因为它一举解决了以下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由于农业同工业的结合，它就为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创造了条件。现在的情况是：“机器到处响，工厂遍城乡”，“进厂是工人，下田是农民”，农民自己办工业，大部分的农民可以直接转化为工人。

第二，在工业和农业结合的同时，必然伴随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样的事例很多，浙江长兴耐火器材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厂是几十个复员军人搞起来的，他们原来没有什么技术。怎么办

呢？他们总结了一条经验，这就是“苦学苦练，提高技术”。这样，仅仅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全厂的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培养出了四个技师，原来的二十二个复员军人，对全厂生产的十三道工序都已经能单独掌握操作，其中十五个人已经分别达到四——六级的技工水平，有的同志还能看懂工艺设计图样。这不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写照吗？在全民大搞钢铁的运动中，估计已经培养了一千万左右熟悉钢铁冶炼技术的干部和工人。现在的人民公社，到处大办红专学校、农业中学、农业大学、技术学校、有的还成立科学研究所。这就为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创造了条件。

这样看来，毛泽东同志所提出来的“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一个创造性的发展，因为它具体地解决了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问题，同时又解决了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道路问题。这一理论上的巨大贡献，将产生无限的威力和深远的影响。让我们高举着毛泽东的旗帜向共产主义迈进吧！

## 广东省全党全民学习理论热潮继续发展

最近两个月来，全党全民学习理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已经在广东省各地蓬勃地开展起来。到十月下旬为止，据广州等三十七个县（市）不完全的统计，已经建立了党校1,561间，红专学校21,289间，参加学习的人数达371万5千多人。运动发展得较快的县（市），已经形成了群众性的学习热潮。如江门、紫金等九个县（市）参加学习的人数达总人口50%以上；顺德、肇庆等六个县（市）参加学习的人数也达到总人口40%以上；广州参加学习人数达到50万人。在这些地区群众打破了对理论的迷信以后，就兴高采烈地学习起来，学理论、用理论在工人、农民、干部、居民、教师和学生中，已经蔚然成风。

在学习方法上，一般都贯彻了从实际出发，总结工作经验，学习理论的方针。大部分地区都以“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学习内容，当前则以学习“矛盾论”为主要内容。通过学习，大多数群众已能初

步运用“矛盾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解决当前生产上、工作上、思想上的实际问题，大大推动了全民搞钢铁，确保晚造丰收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胜利。由于工农群众在学习中能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来掌握毛主席的思想武器，因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们都感觉到学了理论，共产主义的觉悟提高了，眼光看得远了，干劲更大了，工作做得更好了。例如新会县司前人民公社社员在公社成立之前，学习了“人民公社好”和“矛盾论”以后，认识和运用了矛盾论的基本原理，查出了小社同生产大跃进之间矛盾，认识建立人民公社的必然趋势和优越性，批判了本位主义思想，掀起了保穗攻粒，大搞钢铁和滚珠轴承，全民练兵，全民学理论学科学，鸣放大字报和诗歌化，消灭“五害”等六大高潮。许多事实证明，劳动群众能够学好理论，能够掌握毛主席的思想武器，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进一步发挥更大作用。（瑒）



# 畧論大搞鋼鐵事業

## 沉 潛

今年八月，党中央向全党全民发出为在今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噸鋼而奋斗的号召，两个月来，从城市到乡村，从冶炼工业部門到非冶炼部門都燃起了熾烈的火焰，开展了一个向時間爭取鋼鐵的伟大的斗争，工人、农民、干部、学生，甚至老幼妇孺都参加了战斗。目前，全民炼鋼热潮正在全国繼續汹涌澎湃。

为什么我們现在要大搞鋼鐵事業？生产1,070万噸的目标能否实现？怎样去实现？达到这个目标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有多大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是全国人民关心的重大問題，我們有必要認清这些重大問題。

大家知道：我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过去在帝国主义、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和压榨下，經濟非常落后，遺留給我們的工业产业十分可憐。解放前鋼鐵生产最多的一年也不到一百万噸，临近解放的前几年，鋼鐵工业几乎处于癱瘓的状态。解放后，由于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立即展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三年恢复工作，接着实施了社会主义經濟建設，取得了第一个五年計劃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鋼鐵生产方面，1952年年产135万吨，居世界产鋼国家的第十八位，1957年便达到535万吨跃为第九位。毛主席总结了过去几年来的建設經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一書中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針。这条方針的贯彻，首先导致了农业的大跃进，解决了在过去經濟建設中农业相对落后于工业的矛盾，而且向工业提出了繁重的任务，要求工业迅速发展。现在，在整个国民經济建設中所存在的矛盾，已經不是农业相对落后的問題，而是工业发展相对落后要赶上去的問題了。

新的形势要求工业生产也来一个大跃进。关于這個問題，党中央已做出了具体措施，把党的领导的主要力量从农业轉到工业。但工业是多方面的，有重工业也有輕工业。即重工业中，也有鋼鐵冶炼、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等等之分。这样众多的的具体

工业部門，那一些是整个工业的主要部門，那些部門对整个工业发展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呢？这是领导工业生产大跃进必須首先解决的关键問題。如果找不到这个关键，那么整个工业的大跃进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們搞經濟建設，在制訂整个国民經济計劃时，必須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針，这是以馬克思主义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理論为根据的。因为只有生产資料的优先增長，才能保證扩大再生产所需要追加的生产資料。而在生产資料的优先发展中，生产生产資料的优先增長，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我們說机械工业是整个工业的核心，是主导的部門。为使工业建設也来个大跃进，自然必須抓住机械制造业。可是机械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鋼鐵，这就必須特別重視鋼鐵冶炼工业。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工业的中心問題是鋼鐵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的生产又决定于鋼鐵生产的发展。”这就是說，鋼鐵的生产是重点中的重点。只有保證鋼鐵生产的发展，才能促进机械工业从而整个工业的发展。今年是我国第二年五年計劃实施的第一年，建設規模大和速度高，要开展技术革命，要大、中、小工业同时并举，并在全国范围内举办許多基本建設工程；还要进行建設以现代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输網和邮电網。万弩齐发，对于鋼鐵的需要数量隨着增加，而且需要的時間更迫切。面临着这样一个大跃进的形势，就要求鋼鐵生产赶上去，不能慢慢来，否則，便不能配合大跃进形势的发展。

为此，党中央在今年五月曾建議將今年的鋼产量从原定計劃的620万吨增加到800万至850万吨，但仍嫌太低，經過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會議討論，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鋼鐵生产翻一番，即从1957年的产量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这个伟大的号召，就是为保證当前工业生产和建設中的重点問題同时也是为解决建設中的速度問題而提出的。大搞鋼鐵生产，把鋼鐵生产放在各部門、各地方的首要地位，就是抓住了整个工业的主要环节，以鋼为綱，使鋼鐵工业的发展反过来推动一切与它相联系

的工业部門也同时跃进，例如采煤炼焦、交通运输等等，也必須作相应的跃进，这就使得整个工业部門都动了起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在生产資金更多的积累和大规模集体生产的基础上，要求机械化和电气化的规模也随着增加，有着鋼鐵工业的支持配合，也就更有利于改造农业和解放农村的劳动力。正是由于这一切原因，所以把鋼鐵产量翻一番，对于我們迅速完成社会主义建設具有重大的意义。

积极大搞鋼鐵事业的意义还不仅仅限于經濟方面，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因为帝国主义的存在是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并不因为我們爱好和平而放弃侵略。帝国主义在目前还不断在世界各地制造紧张局势，还霸占我国的台湾、澎湖、金門和馬祖，正如第十期“紅旗”杂志評論員指出：“美国侵略者欺侮我們，就是因为我們的鋼鐵还太少了”。这是因为现代的軍事装备和各种武器如飞机、大炮、战車等等，都需要鋼鐵制造。鋼鐵生产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国防力量的强弱。我們的国防力量强，我們就要有力量制止战争，更有效地打击帝国主义侵略者。帝国主义国家是怕硬欺軟的，他們常常利用人們害怕战争的心理，得寸进尺的进行侵略。我們只有通过坚决的斗争，才能迫使帝国主义知难而退，使紧张局势緩和下去。过去以至今日，我們和帝国主义不断斗争的許多事实說明了这个道理。因此，我們的鋼鐵产量能够翻一番再翻一番，在短时期内赶上并超过英国，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和平竞赛的胜利，也就是我国对和平事业的貢獻。此外，我国这样高速度地发展鋼鐵生产，这样迅速地实现工业化，对一些落后国家，特别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东方国家，有着极其巨大的鼓舞作用。他們能看到一个光輝的榜样，就能坚信自己的未来，对自己国家的发展前途满怀信心，从而加速他們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縛，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现在，摆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完成在今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鋼的这个任务？党中央政治局扩大會議发出号召时是八月底，距离年底不过四个月時間，要把鋼鐵产量翻一番，从時間來說，是比较紧迫的。不管西方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对我們如何毀謗、中伤，但是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气魄前进的中国人民是不会怀疑党这个号召的正确的。我們是唯物論者，必須重視根据客观条件去做事。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去完成1,070万吨鋼鐵的生产任务。那末，我們能够完成任务的根据是什么呢？

第一、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已經建立了和正在建立着一批拥有现代化設備的大、中型鋼鐵企业，这是我国鋼鐵工业的骨干。如鞍鋼即有十一万多职工，今年的产量可增达四百五十万吨；仅鞍鋼第二炼鋼厂十六号平爐即能用五小时又四十分鐘炼出一爐鋼。鞍鋼只是我国一个大型鋼鐵基地，其他如武汉、上海等地，也有不少的大、中型鋼鐵企业，生产的数字也很可观，也是我們完成1,070万吨的可靠力量。而且这些已經出鋼的企业，生产潜力是很大的，只要好好执行党的政策和发动群众，就一定能够在巩固已有成績的基础上，发挖潜力提高产量。还有，包头、湖南、太原、石景山、馬鞍山、重庆等地正在兴建和扩建的鋼鐵企业，还可以打破过去的施工常规，加速建設的进度，争取尽快投入生产，这也是一支不可輕視的力量。大、中型的现代鋼鐵企业产量大、效率高，对保証1,070万吨鋼鐵生产計劃完成，是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的。

第二、我国有丰富的矿产資源。大搞鋼鐵是需要大量煤、鉄等矿产的，几年来的地質勘察工作已証明我国的鉄矿和煤矿蘊藏丰富，而且分布的地区很广。如广东省，經普查檢驗有价值的大矿点共六十九个，鉄的儲蓄量共达三十多亿吨，可供年产六百万吨到八百万吨鉄开采五十年的需要。焦煤炼煤亦可达四十余亿吨。我国的煤、鉄矿点还不断有新的发现，九月中旬，仅山西一省，即发现鉄矿資源达五十亿吨以上，几等于英国全国的鉄儲量一倍半。这些都是我們发展鋼鐵生产的有利凭借。

第三、我国有六亿以上解放了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以坚强的意志和正确的步伐，争取新的跃进。經過敢做、敢想、敢說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倡导，他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更能够做出我們的前人意想不到的奇迹。他們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了现代化的技术指标。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子孙的万代幸福，为了建設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六亿人民不特愿意而且可能在鋼鐵战线上創造出更大的奇蹟。

第四、农业方面，由于我国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粮食問題已基本过关，这就有可能为工业提供更多的粮食，有可能为工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同时也使党能够把領導力量从农业轉移到工业方面。在我国，工业推动农业，农业亦能推动工业；有了充足的粮食，也就为发展鋼鐵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我們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毛主

席的英明正确的领导，有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重要保证。

如何才能迅速完成1,070万吨的钢铁生产任务呢？这个问题，曾经出现过两种方法的争论：一种是主张，搞大型、洋式的，让少数专家来搞；一种是主张发动群众，暂时用小土的办法来搞。用前一种办法，那就必须要有成套的设备，较高的技术和较多的资金，更大的问题是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搞得起来。党采取后一种办法，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以小型、土办法为主，大搞群众运动。在已有的大型钢铁企业中，也发动群众，挖生产潜力，提高生产，这就是大、洋、群和小、土、群的同时并行，两条腿走路的好办法。

群众运动是我们进行革命斗争的一条基本路线，它可以争取千百万人参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它所发出的力量决不是由少数人参加那样所可比拟的。在这共产主义觉悟已进一步提高的形势下，只要把大搞钢铁事业的政策、任务和意义向群众说清楚，广大群众就会明白为钢铁而战，就是为共产主义，为子孙万代幸福而战，就有可能在短期内行动起来，一往无前的去干钢铁生产工作。目前，日产千吨、万吨钢铁的县已经象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各地涌现，这就证明发动群众的效果是巨大的，无可怀疑的。在群众面前袖手旁观，指手划脚，泼冷水，找岔子，是不对的。搞群众运动，当然包括农民在内，我国农民人数最多，发动群众，一定要发动农民。钢铁事业没有农民，也同我们的革命事业没有农民参加一样是不可想象的事。现在农村已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农民群众搞钢铁生产无论从人力物力方面都很充分。广东省许多地方，因为在钢铁战线上发动农民参加，适当安排了农业生产任务和钢铁生产任务，结果，钢铁生产也象农业生产一样，大放卫星，创造了日产生铁87万吨、一举完成今年产铁任务的奇迹。

如果说，“洋”和“大”，要搞群众运动去扩大生产；那么，“小”和“土”，从动工兴建炉子一直到投入生产，扩大生产，和群众运动更是密切不可分离的。因为土、小，在群众中有历史传统，投资少，炉子的构造简单，到处可以兴建；而且兴建快，几个钟头就可投入生产，利于遍地开花。这样，城市能办，乡村也能办，学校机关也能办，甚至

非专业的老幼妇孺都能办。同时，能够就地取材，就地使用，生产时间和生产地区都很灵活，不受水电设备的限制，可以移近矿区生产，边建边炼，边炼边建；也可以连续生产，或间歇生产，这是投资多、需要成套设备以及建造时间、技术复杂的洋、大所没有的优点。因此，党中央指示：土洋并举加速发展钢铁工业，而要达到投资省一半，速度快一倍，产量翻一番，则必须很好地重视小、土、群。当然，洋炉的产量高，成本低，用人少，寿命长，也是小、土所没有的优点，为了满足大量建设的需要，钢铁生产必须多建洋炉，这是没有疑问也没有人反对的。但是，发展的趋势和目前所采取的措施，并不矛盾。在目前投资和设备限制的条件下，多搞小、土，不但不会影响洋大，而且对将来多建洋、大，有很多好处。小、土可以发展成洋、大，为洋、大培养技术人材和准备物质力量。提倡小、土，并不是因为它先进，而是以土带洋，土、洋并举，两条腿走跑；有洋有土，就能够争取时间尽快完成1,070万吨的钢铁生产任务。

采用小、土、群的办法来大搞钢铁生产就使广大群众在全民炼钢运动中得到锻炼，知道集体力量的伟大和协作的重大意义，在工地炉前、荒山野地受到共产主义的教育，知道如何解放思想，克服困难，这就能巩固他们吃苦耐劳的品质和丰富他们的工业知识，从而可以在钢铁战线上培养出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冶炼技术人员，为今后更大规模发展我国钢铁及其他金属的冶炼工业准备了充分的技术干部。采取小、土、群的办法来发动全民炼钢铁，还使广大的农村建立起钢铁工业，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炼铁炼钢，亦工亦农，这就为逐步消除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差别，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完成1,070万吨钢铁生产任务的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在这中间难免没有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这就要求党委能亲临前线，抓思想，进行思想教育；及时检查督促，发现和解决存在问题。钢铁生产工作牵涉面广，技术复杂，还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各方面的协作，统一调度冶炼设备及原材料、技术力量；组织商业、交通运输等部门为钢铁生产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1070万吨钢铁生产任务的按期完成。

#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和分配关系的性质问题

高天放 黄 迅

人民公社在我国广大农村已经普遍地建立起来了，这一个崭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相结合的組織形式的出现，是农村中社会关系的一个重大变革，并向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有许多新问题，由于人民公社的成立时间尚短，而且还在不断地发展中，一时尚难作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但根据各种调查材料和基本政策，我们对某些问题，不妨试行探讨。本文拟就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关系中所有制和分配关系这两方面的若干问题，试行探讨。

关于我国农村中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的性质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曾有所规定：“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这也就是说，人民公社在目前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亦已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了。

人民公社之所以基本上是集體所有制，主要是因为生产资料（包括了社員的全部自留地、私有的房基、牲口、农具和林木等生产资料）基本上归公社公有。与此相联系，并由此决定，公社所经营的一切经济事业的收入，都归公社支配。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比起高级社的集体所有制，是更彻底的，因为它消灭了一切私有制的残余，而且是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实现的，因而也是更加社会主义化，更加集体化的。

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表现于更彻底地和更大规模地实行集体所有制这一方面，还表现于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已存在着全民所有制的成份这一方面。如何理解这一点，正是

本文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由于人民公社实现了工农商学兵的結合，因而它同农业社不同，它已经不再是單一的經濟組織，而是經濟、文化、政治、军事的統一整体。更由于政社合一，这就必然使农业社的集体经济和乡、县級的国营經濟密切結合起来。原来属于各个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經濟事业，固然归公社所有并由公社支配和管理，就是原来属于国家的乡級县級国营經濟事业的生产资料和資金，也統一由公社掌握和管理。这样在公社整个經濟活动中，国营經濟和集体經濟的活动就結合成为一个整体，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就在公社内部有机地結合起来。

在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中已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成份，首先表现于它包括了国家下放給公社的地方国营企业和財貿机构。根据最近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財貿工作會議的決議，为适应公社化的新形势，改进农村財貿体制，实行“两放”“三統”“一包”的办法，规定国家在农村的財貿部門的基层机构，除了为几个公社或者更大范围服务的某些机构外，全部下放給公社，放人員、放資金，人員为公社人員，資金一律归公社使用。今后，这些單位既是人民公社的組成部分，又是国家財貿部門的基层單位。这些机构以受人民公社领导为主，并接受上級財貿部門的业务领导。人民公社在具体管理这些經濟單位时，要无条件地执行国家的統一方針政策和統一計劃，并根据国家规定的統一流動資金管理，保證流动資金一般只用于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轉所需要的流动資金方面，不得使用于基本建設投資及其它用途。并实行財政任务包干制度，把国家在农村中的农业稅、工商稅、下放企业收入、事业收入和地方附加等收入，統一計算，扣除原来由国家开支的行政費和事业費，由公社按收支差額，包干上交。这样“下放給人民公社的財貿机构，一方面是公社的組成部分，同时又是国家財貿部門的基层單位。这实际上更增加了人民公社的全民所有制的成份，加强了国家对于人民公社的领导，更加便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见10月27日人民日报）这是公社

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最明显的表现。

在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全民所有制成分的另一表现是：某些原来由国家 and 农业社共同投资建设经营的工矿企业、牧场或农田水利工程……等，在人民公社化以后，都已交公社经营管理，这些经济单位或农田水利设施，就成为公社整个经济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经济单位或水利设施在转归公社经营管理以后，它们的资产中那些原来属于国家所有的部分，并没有改变国家对它的所有权，也就是说这部分仍然是全民所有。这些也是公社集体所有制中的全民所有制成分。

除了上述这些以外，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归谁所有这个问题也必须加以研究。

大家知道，我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并没有实行土地国有，而是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把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归农民所有。土改以后，党领导全国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广泛组织带有社会主义因素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随后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初级社中仍然保持农民土地的私有制，农民还可以按其入社土地的多少取得土地分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成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了土地分红，土地也就由农民私有变成合作社集体所有。土地的私有制废除了。随着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使得规模较小，集体化程度较低的农业合作社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大型的、集体化程度较高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土地所有权性质也起了相应的变化：它已经不是农业社较小范围内的集体所有，而是整乡、甚至整县范围的公社集体所有，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进一步扩大并且提高了。特别是由于乡社、县社合一，就使得公社的土地实际上变成公社集体和国家所共有。正是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在人民公社对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中，已经有了全民所有制的因素。随着人民公社集体化规模的进一步发展（由一乡一社发展为县联社或一县一社），公有化的范围的扩大，以及社员共产主义觉悟的进一步提高，土地方面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将逐步增长，作为农业生产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将很自然地全部转变为全民所有。土地方面全民所有制因素，随人民公社化进一步发展和深入而不断增长。土地国有问题就将得到实际的解决。这是我们所考察的“在公社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全民所有制成分”这一论点的主要内容之一。

对土地问题的分析，原则上适用于对公社所拥

有的一切生产资料和非生产性的公共财产。也就是说，由于政社合一，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在公社内部密切结合，事实上导致了公社与国家共同支配和管理公社的一切财产，从而使公社集体所有制中有着全民所有制的成份。我们对所谓全民所有制成份这个概念，不应仅仅着眼于公社中那些原来属于国家所有的经济单位和资产，还应该看到在公社经济中那些实际已经存在，但在形式上还不明显的国家所有权和基于这种所有权的支配作用。这种支配作用，与国家对于公社的计划领导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但在形式上却相结合。事实上在公社的生产资料、产品、劳动力和资金的安排使用上，也已存在着突破集体所有制的情况。现在有的公社的积累部分地要受政府支配，这表现为公社要将一部分积累交县联社支配。同时由于农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现在往往出现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大协作，这些协作，往往超出乡界、县界，公社社员自带工具粮食去支援别个公社、别个县的生产。这在事实上也已突破公社集体所有的界限，因而在实质上也就是公社集体所有制中的全民所有制因素。随着公社的发展，有些地方已成立了县的联社，在全县范围内统一调配、调剂和使用生产资料和公共积累资金。这样由县统筹举办经济事业，事实上已等于国家有权动用公社积累来实行国家投资，那就更加说明了集体所有制中全民所有制成份的存在与增长。

我们对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的性质，必须从发展的观点，从实质看问题。应该肯定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不过它是比高级社更彻底、更社会主义化的大集体所有制，而且在公社集体所有制中已经包含着全民所有制的成份。在人民公社内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正发生着质变，旧质的规定性（集体所有制）由于新质因素（全民所有制成份）的存在和积累，正在发生着变化，因而它是处在一种质变的过程中。正因这样，所以我们说由农业社到人民公社是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跨进了一大步；人民公社是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最好形式。

## 二

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人民公社的产品分配，除了扣除生产费用，扣除国家税收、扣除用作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和公益金以外，其余作为消费基金分配给社员，目前人民公社对于消费基金的分配，一般已开始实行半供给半工资的分

配制度，这比起农业社原来按劳动日計酬的分配制度來說，是一个重大的变革。这种新的分配制度的实行，已經开始突破按劳取酬的范围，使得人民公社的分配关系具有和农业社不同的新的性質。

那么人民公社分配关系的性質是怎样的呢？就已經实行半供給半工資制的公社來說。一方面它們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分配关系，这是主要的一面；另一方面它已經有全民所有制的分配关系的成份。此外，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还出现了共产主义分配关系的因素。

为什么說人民公社的分配关系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分配关系呢？我們知道，产品分配关系是以生产資料的占有关系为轉移的。既然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生产資料集体所有制，这就决定了公社的产品分配关系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的分配关系。首先从产品分配的范围来看，公社的产品分配基本上以本公社为范围，自負盈亏。它不象国营企业那样，产品分配超出本企业的范围，在全民所有的范围内进行。公社的产品分配無論是积累和消費的分配，或消費部分中用于供給制部分和用于工資部分的分配，都受本公社总收入所制約。正因为这样，在各个公社之間，由于生产水平高低和生产經營好坏的不同，总收入不同，从而积累的多少，供給范围和工資标准的大小也就不一致。生产水平高，經營管理好的公社，純收入較多，就会积累多些，供給范围大些和工資标准高些；反之，生产水平低，經營管理不好的公社，純收入較少，从而积累就少些，供給范围就小些和工資水平就低些。其次从产品分配的形式来看：目前人民公社消費基金的分配，一般实行了半供給和半工資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其中供給制部分已經突破了按劳分配的范围，具有共产主义分配关系的因素（这在下面將加以分析）。至于工資制部分，基本上仍屬按劳取酬，工資的多少主要是以劳动的数量和質量为轉移，在这一点上它是同国营企业现行的工資制基本相同的。但是，人民公社部分消費基金的按劳分配，是在集体所有制的范围内进行的，即它是在公社范围内来实现同工同酬，多劳多得的，因此它同国营企业的按劳分配又有如下的差别：第一：人民公社的工資发放，在一定程度上受年成丰歉的影响，在正常的年成时，工資照规定的标准发放，丰收增产增收时，工資标准会适当提高，但在受灾减产而又不能用其他收入弥补时，就会根据具体情况适当降低工資标准。例如河南省檀山卫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第十四条就有这样的规定：“在公社收入較多，社員需要較大

的月份，工資可以多发，其余月份可以少发。遇到特大灾害，可以酌情少发工資”。而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中，不論生产經營情况如何，有无赢利，只要劳动的数量和質量相同，就发给同样的工資。第二，在各个公社之間，由于生产水平和經濟条件的不同，工資标准不一致。例如广东省各个公社工資水平就参差不齐，有的按不同等級每月四元至十五元，有的两、三元不等，相差一倍到几倍；而在同地区的不同的国营企业中，同样工种的同級工人的工資标准基本相同。为什么有上述两个差别呢？这是由于目前公社基本上仍是集体所有制，从而它的分配关系也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的分配关系的緣故。

人民公社的分配关系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分配关系，这是人民公社分配关系性質的主要方面。除此之外，由于公社集体所有制中已經包含全民所有制成分，因此，又使公社的分配关系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分配关系的成份。这表现在下列三方面：首先，公社总收入中，原来屬于国营工商业的上繳利潤那一部分，在实行財政包干的办法以后，它經由財政渠道納入国家所掌握的总产品中再进行再分配，这实际上等于公社产品的一部分，参加了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分配。这也就是人民公社分配关系中有了全民所有制的分配关系成分。其次，公社积累資金的一部份，要上交县以上的机关统一筹办地方性和全民性的生产事业和福利事业。这样，公社积累基金的分配已經有一部份冲破集体所有制的范围，而具有全民所有制分配关系的因素了。最后，即使在公社的消費基金的分配中，也有着全民所有制分配关系的萌芽。因为尽管目前各个公社消費基金的分配基本上沒有超出公社范围，并且供給部分范围的大小，工資标准的高低以及两者之間所占的比重，会因各个公社經濟条件和生产水平不同而互不一致。但是在政社合一的条件下国家参与了公社供給制范围的规定和工資标准的制訂，这就可以看作是公社分配关系中所包含着潜在的全民所有制的分配关系的因素。

在人民公社的分配关系中，在实行按劳分配同时，还出现了共产主义分配关系的因素。这表现在实行半供給制这一点上。目前人民公社实行供給制的范围和內容虽然各有不同（有的实行粮食供給制，有的实行伙食供給制，有的实行基本生活需要供給制，有的实行伙食、衣服、住房、文教等“四包”，有的实行食、衣、住、教、医、生育和婚丧等“七包”，有的还“十包”以至“十二包”），但是在公社分配用于供給部分的消費基金时，已經不是以社員

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转移，而是在现有的生产水平下和在供给制范围内，实行按需要来分配了。不论各个社员劳动力的强弱，技术的高低和家庭负担如何，大家都平等地在供给制范围内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消费品，这就冲破了“按劳取酬”的框子，冲破了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和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分配关系了。在这一点上，尽管人民公社所实行的供给制还受集体所有制的制约，但它所体现的分配关系，比起全民所有制企业现行的分配制度及由它所体现的分配关系却是更进步的。因为目前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只是在福利事业上有着共产主义分配关系的因素，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主要还是按劳取酬，而人民公社却已经在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方面，实行按需要来分配了。

除了探讨人民公社分配关系的性质之外，我们在此还想考察一下由于人民公社实行半供给半工资这种新的分配制度，对生产关系另一个方面即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我们都知道，在社会主义下，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是同志般的互助合作的关系。但这所谓平等关系，在未实行各取所需之前，主要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剥削的不平等而言的，也就是说每个人平等地废

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每个人都平等地是公有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之一；除了不劳而获，每个人都有参加劳动生产的平等义务和以等量劳动领取等量社会产品的平等权利。由于实行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而每个劳动者的体力、技术和家庭负担又不一样，所以在享受社会产品方面，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即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现在人民公社在分配个人消费基金时，供给制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分配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这种重大发展与变革，丰富了平等关系的内容，加强和丰富了互助合作关系的发展，对逐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实际的平等起了促进作用，这就必然影响到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还不只是供给制，就在工资制方面，由于把思想觉悟和劳动态度作为评定工资等级的主要条件之一，并把它们摆在首要地位；又把服从领导、积极工作、积极参加生产、按时按质完成任务、爱护公共财产、随时随地向坏人坏事作斗争、思想进步、努力钻研技术、并能推进技术和每月出勤28天以上等等，作为得奖的条件，这就促进社员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培养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精神和风格，为逐步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有利条件。

## “广东历史资料”即将出版

经过了短期的筹备工作，“广东历史资料”（季刊）在1959年元旦就要与读者见面了。

在为政治服务和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编辑方针指导下，“广东历史资料”将与有关部门协作，负担起搜集、搜集和刊布有关广东的历史和考古方面的资料——特别是近百年来人民革命斗争资料的任务，从而促进历史科学的繁荣。

“广东历史资料”以原始资料作为主要征集对象（如文献、档案、函电、调查报告、访问记、回忆录、日记、笔记、图片、拓片、著作稿本、罕见的报刊书籍、具有历史价值的关册、帐簿、田契、凭单等），兼及资料性的文章和有关

资料的调查整理的动态报导。范围力求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风土、民俗和少数民族状况诸多方面。

“广东历史资料”是在“广东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负责编辑出版的。

广东省的历史是我国历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而近百年来更充满了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光辉篇章，从旧石器时代以迄今日，史料文物确可称为浩若烟海。因此，“广东历史资料”的出版就是非常必要的。

（磊）

# 重讀“改造我們的学习”的一点体会

孙冰

毛主席的“改造我們的学习”的报告发表距今已經十七年了。正当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掀起以毛主席的著作作为綱的学习哲学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全民性运动的时候，重讀毛主席的这篇著作，就更进一步地体会到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的不朽的指示，到今天还是一样地光輝燦爛，字字中肯，对目前展开的全民学哲学、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毛主席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所作的这篇报告，和“整頓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文章，是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篇报告里，主要是批判了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的学风。毛主席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这种主观主义的学风，提到了非常严重的地位。他強調指出：

“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导革命，則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純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同时毛主席認為，所謂学风問題，不仅仅是学习的作风和态度問題。他在“整頓党的作风”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学风問題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問題，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問題。既然是这样，学风問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个重要的問題”。毛主席这个报告，当时在党内外起了广泛的影响和深刻的教育意义。从此，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开始得到了克服，主观主义大大减少了。在我們党内，在广大的干部中，在广大知識分子阶层中，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水平大大地提高了。

在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方面，毛主席所反对的是怎样的教条主义态度呢？那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單純地学理論而去学理論。

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毛主席教导我們，这种学习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馬克思主义的，同时告誡我們要遵照一条基本原则：“理論和实践統一”；要反掉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論和实践分离”。

从最近开展起来的工人农民学哲学的运动中，使我們看到了工农群众的实事求是态度，他們一开始就掌握了毛主席早就指示过我們的学习态度和方法。首先是他們学习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解决他們当前生产中、工作中、思想上存在的問題，毫无哗众取宠之心和华而不实的态度。因而他們的学习方法是有的放矢，从当前的实际問題出发，摆生产中、工作中、思想上存在的問題，然后从毛主席的“矛盾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等著作中去找理論根据，找分析的方法，找解决的办法，从而立即解决实际問題。他們正确地运用了“实践——理論——实践”的公式。这不正是毛主席所教导我們應該采取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嗎？

但是，现在回溯起来，还有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对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体会是不够的。而在解放后的八九年来，对毛主席这篇諄諄善誘的报告，似乎逐渐淡忘了。几年来在职干部曾經学习过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学习过联共（布）党史，学习过政治经济学，学习过哲学……。在学习的时候，虽然強調了理論联系实际，但在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上，实际上还没有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縛，沒有很好地贯彻毛主席和党的号召。关键問題在于目的不够明确，还有为学习理論而去学习理論的傾向；在方法上则是从概念出发，采取了“理論——实际——理論”的公式。因而在学习理論时，首先是將成套經典著作从头到尾搬过来作成提綱，一章一节地从概念上学下去；所謂联系实际，實質上是不着边际，不是为了解决我国的实际問題，結果还是回到概念上去。例如，我們学习联共（布）党史“新經濟政策时期”一章的时候，主要还是从理論出发，所謂联系实际，也只是用書上的理論来套一套我国过渡时期的某些經濟政策和措施。而不是首先从我国过渡时期的政治、經濟的特点出发，研究



我国过渡时期的各项政策来吸取苏联新經濟政策时期对我国当前建設有益的合乎中国实际的經驗。学习政治經濟学，也是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开始，按章照节，从概念到概念地学下去。不是从中国各个社会經濟形态的特点出发来研究学习政治經濟学，結果是学习了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而不能解释中国封建社会的經濟形态，学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不能解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解释鴉片战争以后中国經濟淪为半封建半殖民經濟的問題。其結果是学习的人觉得枯燥无味，理論“难啃”，学无所用，得益不大。这样的学习方法，實質上还是教条主义的，是和毛主席所指示的学习方法和态度相违背的。毛主席在这篇报告中早就严正地批判了这种学习方法和态度：“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經濟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諸如此类。其結果，謬种流传，誤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酈县就不能用。經濟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只是由于我們对毛主席的教导体会不够或是淡忘了，才长期以来束縛在教条主义的柱子上而不自觉。

这回工农群众开展了学哲学、学理論的运动，坚决地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縛，使我們的学风，面目一新。它一方面使广大的群众初步破除了学哲学学理論是高深奥妙的迷信，很快就感觉到学习哲学和理論的用处大，不仅提高了理論水平，而更主要的是解决了当前存在的实际問題，使学用一致起来，也就是使理論和实际統一起来。另一方面，在广大的在职干部和知識分子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应。反应有两种：一种是感觉到从工农群众的学习态度和方法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省悟到自己过去学习和研究态度和方法的教条主义的傾向，从工农群众的学习态度和方法中，找到了真正的理論和实际統一的門径，都愿以工农群众的学习为师，改造我們的学习制度和办法。目前，广大的干部和知識分子，在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下乡下厂参加劳动的号召的同时，也开始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同当前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例如，从办人民公社的实践中去作詳尽的調查研究，占有材料，来分析和研究由于人民公社这一嶄新的社会組織形式的出現而产生的一連串新問題，如生产关系的改变，共产主义的萌芽，向共产

主义过渡的形式，和在当前人民公社中实行的經濟政策等問題；从目前农村大办工业的实践中去研究党中央提出的工农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土洋并举等方針問題。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这符合毛主席所指示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毛主席教导我們：“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区外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內部联系，作为我們行动的响导。而要这样做，就須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热情，不凭死書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結論。”但是也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反应，这种反应大多来自少数高級知識分子的学者專家。他們看不起目前工农群众学哲学和理論的态度和方法。一則曰这种学习很肤浅，沒有系統性；一則曰將哲学和当前的生产、工作、思想問題混在一起，是庸俗化。是肤浅嗎？我們說目前首先是为了普及，但毫无疑义，工农群众的学习將由浅入深，由普及逐步走向提高。就目前工农学哲学的情况看来，他們开始掌握了唯物辯証法的精神實質，开始用唯物辯証法来处理生产、工作、思想問題是一点也不肤浅，比起一些在談空洞的“理論”夸夸其談，碰到实际問題时一窍不通的教条主义者要高明得多。是庸俗化嗎？他們所謂的高級是什么呢？是背誦經典著作的詞句，言必称希腊。因而他們对工农群众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方法称之为庸俗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关键問題是这些人的资产阶级的白旗还没有拔掉。毛主席对这种人作过深刻的批判：“他們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国。他們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又說：“还有不少人，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書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不費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們对这些人應該作启蒙运动。”

毛主席对我們作的这些指示的时间已經过了十六、七年了。但是在全民开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今天，重新再学习毛主席的这篇著作，仍然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毛主席在十七年前就建議：“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問題为中心，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針，废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我們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应以此为方向。

# 进一步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

## 本刊编辑部

一年多来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我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一项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全国一样，广东整个文化、教育、科学界的情况和思想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打垮了在文化、教育、科学界的右派分子，巩固和加强了党在文教科学方面的领导，到处插起了红旗。其次是文教科学界的大多数人，都有显著的进步，明确了文教科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再次是认识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彻底改造。在学术思想批判上也打开了缺口，批驳了“为教育而教育”、“为学术而学术”、“厚古薄今”、“脱离政治”、“脱离生产”的错误方向，开始树立业务服从政治、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正确方向。因而使广东文教科学界产生了许多新的气象，各项工作空前地活跃起来。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成果。

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是如此迅速的，在工农业生产不断跃进的形势下，出现了文化革命与技术革命的高潮，接着又出现了全国人民公社化的高潮。现在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已基本实现。这是我国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改变。随着这种经济基础的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形态方面，也必须要有相应的发展和改变。现在全国人民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做积极准备，正在发出冲天的干劲。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凡是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老制度和陈腐观念，都要死亡；凡是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制度和思想，都在发出自己生命的威力。”（红旗杂志发刊词）在此情况下，广东的文教科学界，进一步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包括教育思想）的批判，是势所必然和绝对必需的。我们知道，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方面，只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未彻底解决。这个斗争，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则远远还未

解决。无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必须取得完全的胜利。资产阶级的一切伪科学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必须彻底改造。毛主席指示我们：“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战胜谁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贯彻和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及其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是无产阶级学术思想占领阵地，就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占领阵地，“真空地带”是没有的。因此在这些地方，认真地深入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开展学术思想的批判，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其深刻的改造。就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要继续清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大破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政治上继续改造，而且必须要在学术思想上来一个深刻的自我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下定决心，在党的领导和群众帮助下，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转化为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有一些人对于自己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只是承认下来，但到底错误有多少，错误性质又怎样，却还没有作认真的分析批判；还有很多人根本还没有接触到自己的学术思想；有一些人迫于形势，对于错误只口头承认，心里却不服；有个别的人则抵触还很大。例如他们认为：“政治上你行，学术上还是领导不了我。”可见如果不深入开展学术思想批判，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也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不仅对进一步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着重大意义，而且是实现我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要措施之一。因为要实现技

术革命，必須彻底破除资产阶级在科学技术上的一切陈腐观念和教条，使我们获得思想解放，使我国科学技术密切结合生产实际，贯彻技术革命的群众路线，做到土洋结合、专家与群众结合；为了实现文化革命，必须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清除在学术上的一切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彻底纠正“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为教育而教育”的资产阶级方向，使科学研究和教育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结合实际，结合生产，以便彻底完成我国的文化革命。

目前各高等学校和有些科学研究机关，正在深入进行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改革，首先碰到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还没有过关，改革也就难以深入下去。比如有的资产阶级教授唯心主义的观点根深蒂固，“感情上舍不得唯心主义”。有些人还根本反对从实践到理论再回到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認識論，认为自己掌握的这门科学是特殊的，只能从理论到理论再到理论，因而拒绝科学研究必须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有的资产阶级专家迷信洋教条太深，对群众的许多发明创造，认为没有研究和总结提高的价值，因而还是固步自封，忽视向土专家认真学习。有些资产阶级农学家，对于目前全国出现的丰产高产纪录，并没有感到是一种威胁，因而不去积极进行以丰产高产为纲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改革。有的专家教授，一贯崇拜外国，对祖国丰富的遗产给予很不正确的估价，因而一直还在重外轻中。有的还放不下资产阶级专家的臭架子，因而反对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要走群众路线。有的人对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极深，只想沿着古人的脚印走路，仍坚持其“厚古薄今”的方向。有的否认历史上有阶级斗争，并通过研究中国历史而推崇外国文化的糟粕。在教育思想上“为教育而教育”，“只要劳心、不要劳力”的错误思想，也还未根本克服，这就使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师生按时参加劳动生产和下乡下厂的做法，仍然碰到很多的抵触。有的人表面上拥护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无产阶级路线，实质上仍然坚持其只专不红、少红多专的资产阶级路线。总之，

这些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如果不进一步深入开展批判，就根本不可能完成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的改革。目前在广东文教科学界，不论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自然科学方面，都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学术思想批判。

我们要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和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作积极准备，就要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全体人民，使中国人民从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下完全解放出来，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大大有助于这一任务的实现。

深入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必须贯彻群众路线。只有发动群众来大破，才能大立。开展学术思想批判，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不走群众路线，冷冷清清，不深不透；一种是发动群众，热热烈烈，又深又透。开展群众性的学术思想批判，并不是很困难的，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一切先进的人们都可以学习到。而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看起来好象有点神秘，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完全可以把它揭穿的。因此只要发动群众，边学边干，任何学术上的白旗都能够拔掉。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因此必须反对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群众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斗争，就能锻炼与提高理论队伍，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一般的说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同意见都有他的发言权，给予他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批判学术思想要求真正搞彻底，绝非交战一两回合就能达到，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而且这种斗争，要做更多的细致功夫。因此在批判中必须坚持说服而不是压服。还要估计到在批判中可能有些人要经过多次的反复，这就要耐心等待，积极的帮助和进一步的引导。不用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资产阶级一切伪科学愈争愈伪。让我们深入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在一切文化、教育、学术部门，都高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吧！

# 刘节先生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論批判

戴裔煊

## 从螳臂当車的想头說起

一九三四年，刘节先生写“古史辨”第五册序文的时候，用譏諷的語气来訕笑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家，說：“近来学者好言用唯物史观来制造新历史，这是螳臂当車的想头”。螳臂当車这个譬喻，本来是出自“庄子”“天地篇”的。意思是指螳螂不自量力，以弱小的臂膊来对抗庞大的車輪，固然不胜任，同时这种做法也沒有好結果，巨輪碾过，只有粉身碎骨。我想：刘先生用这样的比喻来譏諷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家的努力，殊屬比擬不伦；反过来，假如用这个譬喻来描繪刘先生自己，我觉得确是“惟妙惟肖”，形容尽致。

刘节先生是一个典型的倔强的唯心主义者，他甘于以此自居，甚至以此自豪。他向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死敌。就我所知，早在一九三四年，他已經企图以馬克思的参考資料不足为理由，来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价值。他說：“馬克思輩发现唯物史观的时候，所用的材料，不外西欧之部，如果拿来解析世界史，总嫌不够。”又在一九四八年刊行的“历史論”一書里，他指責唯物史观这一派人“把历史看作政治宣传品，而忽略历史学上的技术问题”，認為“他們的学說別有用心，于历史学的进步所关不大。”（见“历史論”一四頁）解放后，他对思想改造怀着抗拒的情緒，对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抱着怀疑的态度。他时常向人夸耀，解放后所有新出版的中文譯本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他都应有尽有；他閱讀經典著作很細心，在重要的地方加上圈点和眉批。可是他的目的不是在于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和改造自己的思想。而是企图在經典著作里找漏洞，鑽空子；或者断章取义，找到适用的詞句，来做他自己的唯心主义的理論根据。他自以为自己有一套顛扑不破的理論。他要独树一帜，坚持下去，为他的所謂“真理”而奋斗。他認為一个历史家要象章学誠所說的

那样，仅仅是具备才、学、識三者还不够，最重要是有“史德”。把才、学、識三者凝煉而成“史德”，要具备若干条件，第一項条件就是‘坚貞’。所謂‘坚貞’是什么呢？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坚貞，就是对学問有坚强的信仰。历史家要做到“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有了这种坚强不拔的信仰，才能打定作一切学問的基础，也就是治史的基础。”（见“历史論”五七頁）解放快要十年了，我們的社会，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向共产主义跃进；人們的思想不断在改变，政治觉悟不断在提高，而刘先生怎样呢，由于他具有这样的‘史德’，这样的‘坚貞’，这样的坚强不拔的信仰，十年窗下，故我依然！在不久以前，他还是用这样的語句来表示他自己的态度，并且挖苦別人：“我是真小人，你是伪君子。”他說这样的话时，他的意思暗示：“我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者，心口如一，心怎样想，口就怎样說；你嗎，口說馬克思主义，而實質上是一个假馬克思主义者，一个粉紅色的專家。”他說話时洋洋得意，好象認為別人还比不上他似的。刘先生反对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态度方面这类倔强的表现，看起来，确是象螳臂当車。

我們認為：真理是要坚持的，問題的关键在于所坚持的究竟是不是真理。假如所坚持的不是真理，而是坚持錯誤来反对真理，那么，这样就不能說是‘坚貞’，而是‘固执’、‘頑梗’了。刘先生的情形，显然属于这一种。問題很簡單，唯心主义的东西都是主观片面的，錯誤的，根本就沒有什么真理可言。刘先生自以为‘坚貞’，自以为对学問有坚强不拔的信仰，实际上不过如刘歆‘移讓太常博士書’里所說，“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而已。

我們認為：象太常博士这种态度是很不好的，怕人把真相揭穿了，站不住，企图保残守缺，把錯誤坚持到底。这种做法，于事无补。怕被揭穿而站不住的东西，始終是要揭穿的，始終是站不住的。不破不立，不破除了资产階級唯心主义观点，便不可能把无产阶级唯物主义观点建立起来，因此我們

認為把它揭穿是一件好事情。我們本着這種看法，現在對劉先生的唯心主義歷史觀，提出一些意見。但是，這是思想戰綫上兩條道路的鬥爭，我們必須背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道路，走無產階級唯物主義的道路。我自己的思想也有許多地方受唯心主義的影響。我批評劉先生，有許多地方也就是批評我自己。同時我也歡迎劉先生對我的不正確的思想作嚴格的批評，我願敬謹接受。

## 二

### 劉節先生的唯心主義歷史觀 及其反動本質

歷史觀和世界觀是一致的，一個人怎樣看待周圍的世界，怎樣看待自然和社會現象，也就怎樣看待歷史。劉節先生是一個典型的唯心主義者，首先表現在世界觀主要問題的認識上，也即是表現在他對思維與存在、意識與物質的關係問題的認識上。他是一個客觀的唯心主義者，他把“宇宙意識”作為存在物的基礎。認為這種“宇宙意識”是不依賴於人而獨立存在的東西。他說：“宇宙間一切現象都是‘宇宙意識’的表現。‘宇宙意識’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東西？怎樣來的？這些問題，他是答不出來的，他無以名之，又把它叫做‘天’、或者叫做‘神’、又或叫做‘道’”。他說，“從天體運行、到萬物化生。所有一切經過，就是一部自然史。這部自然史的主宰，可以說是‘天’，也可以說是‘神’、乃至於是‘道’。”（‘歷史論’一一七頁）。事實上不依賴於人而存在的任何客觀意識都是沒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他把本來沒有的東西強說成有，窮根究底，必然陷入神秘主義不可知論的深淵。

由於他認為意識精神是第一性的，宇宙間一切現象都是“宇宙意識”的表現，他對歷史的看法自然也沒有例外。他說“歷史是‘宇宙意識’的反映，也是人類意識的反映”。（‘歷史論’一一八頁）又說，“人類史應該同自然史銜接。上帝計劃之實現，就是世界史。精神的實現、就是世界史的進程”。（‘歷史論’一三頁）在我們看來，歷史，如果就廣義說，不外是物質及其個別形態發展的客觀過程。因為物質運動有各種各樣形態，從個別形態發展的客觀過程來看，這裡面可以分成動植物史、地球史、人類社會史等等。如果當作物質形態統一的发展過程來看，這就是宇宙（世界）史。一般上把自然和人類社會發展過程分成兩個方面來考察，于是有自

然史和社會史。這些：本來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容易分別開來的。可是劉先生硬要把物質及其運動說是出於上帝的計劃；由上帝的意志支配。把本來不神密的東西神密化起來。劉先生的觀點實質上和宗教家的觀點一樣。我們可以說，從這方面來看，他是一個以教授面貌出現的傳教師。

我們認為：在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向共產主義階段前進的大學里，假如讓劉先生依然象過去一樣，宣揚所謂“宇宙意識”、“上帝計劃”這一類的反科學的謬論，就是開倒車，就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事情。

由於劉先生把歷史看作“宇宙意識”或者人類意識的反映，他又以個別人物或少數人物的行動和意志來解釋社會歷史的發展。認為只有這種人才是歷史的創造者。他把所謂富有創造力的人物和人民群眾對立起來，把人民大眾看作渾渾噩噩、無知無識的群氓；他在他所著的“歷史論”里引用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歷史家的話來作這種英雄與偉人史觀的說明，如：“社會的未來進化，仗個人的創造力，集體不過代表平衡及惰性力罷了”。又如：“人類大多數是渾渾噩噩的，缺乏創造能力，少數天才若不拉着大群跟着前進，他們就會落伍。”（‘歷史論’第二頁）劉先生認為這種少數富有創造力的個人和團體行動表現的過程，就是歷史的本質。他完全抹煞了人民群眾的無窮無盡的智慧和偉大的創造力，完全抹煞了人民群眾在推動社會歷史前進中的作用。因而也完全抹煞了人民群眾的歷史。

我們必須指出：劉先生這種觀點不特是反科學的，同時也是反動的。誰都知道，唯心主義歷史觀是資產階級思想家用來反對人民群眾革命運動和奴役他們的工具。劉先生的觀點就是這樣的東西，按照他的說法，宇宙間一切現象，包括社會現象在內，都是“宇宙意識”的表現，都是出於上帝計劃的安排。事皆前定，非人力所能改變。這種說法顯然就是企圖毒害勞動人民的麻醉劑。按照這種說法，一切階級剝削壓迫的不合理現象和因此所引起的痛苦災難，都是出於上帝的安排，命運注定了的，無可改變的，革命就必然失敗。這裡面同時也暗示着制度的永久性和不可變性。

偉人史觀也是同樣性質的，按照劉先生的說法，少數天才偉人和廣大的群氓，都是上帝預定計劃的產物，兩者的“質料”有不同，歷史的本質是少數天才偉人的意志和行動表現的過程。群氓如果沒有他們，便寸步難移，無所作為。那麼，這少數天才享受特殊權利與那廣大的群氓受奴役、剝削、

压迫不是活該的嗎？刘先生的伟人史观就是这样为剝削階級的利益辯护的。

刘先生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本質是反动透頂的。

### 三

## 刘节先生的反科学的历史方法論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就教导我們說：“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曾用附注說明，即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都是階級斗争的历史。”毛主席也教导我們說：“階級斗争，一些階級胜利了，一些階級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见毛澤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历史学本身根本是一門反映几千年来階級斗争的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它是有階級性的。它的方法論的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从无产階級的立场出发，把辯証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历史现象，闡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历史学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而这种方法才是科学方法。所以历史科学和它的方法跟馬克思主义无产階級的立场，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分不开的，离开它們，历史学不可能成为科学，也沒有科学的历史方法。

刘节先生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场，抱着唯心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他的历史方法論完全是反科学的。

刘先生否認历史学是一門科学，他認為只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間的一种学問。”（“见历史論”四七頁）又說“历史这样东西，就是人类的故事。”（见“古史辨”第五冊第四頁）他把历史科学和文学艺术的界綫混乱起来，把历史看做和传奇小說是差不多的东西。他認為历史离不开想象，特别是离不开民族的集体想象。他說：“历史当然是用事实作根据的，离开事实，不会有历史。然而历史可真不能离开想象。从前的历史作品，大半取材于民間傳說。这种傳說如果分析起来，有大部分是出于民族集体想象。”他把小說所传的关公和“史記”“孔子世家”所描述的孔子都說是民族意識的形象化的人物。（见刘著“中国古代宗族殖殖史論”第二頁）他又反对社会发展有客观規律的說法，他認為“从古至今的史实沒有一件事相同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历史上的事实也是一样。”

（“古史辨”第五冊第三頁）他把規律性看作現象的簡單的重演，这种资产階級理論家关于規律性的錯誤的看法，我們不必費詞討論。总之，刘先生不是把历史学看做一門社会科学，而是，看做一种离不开想象的、和传奇小說差不多的、沒有規律的东西。

由于他对历史学是这样的看法，所以他的所謂“历史方法”就很簡單了。一句話說，历史的編写可以按照历史家的意志，要怎样摆布就怎样摆布。刘先生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买办胡适說历史是一个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任你怎样擦抹和裝飾，是一模一样的。胡适曾把历史比作一大堆銅錢，任你如何去摆。刘先生則把历史比作“一堆杂色玻璃片，紅的紅，綠的綠，黃的黃，顏色不一。”一样可以任你摆布，“把它放在桌子上，或者旁的地方，五顏六色，煞是好看。”“虽然有顏色同数目的限制，而摆布者仍旧可以自出心裁，前后一貫，作出一种与众不同的事业来。”（“古史辨”第五冊三至四頁刘序）这是刘先生的历史方法論的精义所在。

他說摆布者可以自出心裁，究竟怎样摆布，出什么心裁呢？他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所举示的方法和內容是这样：

首先刘先生把中国古代史作为表达儒家思想的工具。他在“左传、国語、史記之比較研究”一文里說，“左传、国語、史記三部書，其见解虽各有不同，但是可以看出来都是經過儒家思想澄清过一回的。”也就是“出于一学派的不同作者經過一番见解上与文字上的修飾”的。这种論断确否，我們不必費詞討論。但有一点我們必須指出的是：他对于中国过去历史家把历史作为表达儒家思想的工具，任意歪曲历史的做法，甚为贊同。他举左传的作者为例，他說，“左传作者的头脑比公羊、谷梁作者清楚許多。他能够用文学的力量使我們不期然而然的沉醉于孔子学說之中，使当时学术界先充实起一番儒学的空气。这是如何苦心孤詣地糊造出来的事业呢！”他也不知道这种歪曲历史的做法，“古代必定有許多可寶貴的史料給这班历史家埋葬掉”，但他認為这是一种“托古改制”的做法，并且是正确的，这样歪曲历史不要紧。他說，“我們现在或許怨恨到他們把古史的实情如何掩飾过去，但是他們的方法对于后来中国文化确乎有很大影响的。”說到这里，他对儒家思想歌頌起来。他接着說，“中国文化能够如此源远流而流長，实在因为从秦汉以下始終抱着这种一貫的思想。这是最大的，最經久

的力量！”（见刘著“古史考存”三三九至三四零頁）

把儒家思想看成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看成最大的最經久的力量，古代历史家用儒家思想把古史的面貌任意改变过以后，結果使到中国社会源远流長。儒家思想的力量和历史家的作用真是伟大啊！古代历史家这种做法真是值得取法啊！这是刘先生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論的具体表现。


刘先生这种看法是完全錯誤的。社会发展是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的，不能以人們意志为轉移的，不应以一家一派的思想任意歪曲历史，这种做法是錯誤的。儒家思想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組成部分，是由封建社会的經濟基础所产生的，它对中国封建社会經濟基础的形成和巩固虽然有一定的作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虽然有过加速的作用。但它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力量。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力量是物質資料的生产方式。同时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是紧密地依賴着基础的，当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时，它同样起着积极的反动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結果妨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理由就在这里。它并不是什么經久的力量。

其次，刘先生把历史作为寄托統治阶级感情的工具。由于他把历史学看作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間的一种学問，由于他認為“艺术的基本原素是感情”，“历史的叙述离不开感情”，所以他主张历史家要把感情寄托在历史著作里。一方面“发作者心中的积郁”，另一方面又“引起旁人的共鳴。”他非常欣賞班固“西都賦”上所說的“据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这两句話，認為“这两句話真能把历史家考察史事以后的真切感情說着了。”在这一点上，他大发議論，說“过去的史实有令人奋发的，也有令人懊丧的。所奋发的都是感情上令人喜的，所懊丧的都是感情上令人悲的。讀者所以能够对于往事发生悲喜的感情，全靠作历史的人能够在史書里先已寄托上一种动人的情緒。”这是刘先生的历史方法論的又一要义。刘先生說得很好听。他說，“这种感情并且應該是出于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否則不会发生作用”。好象是一种超阶级超时空的普遍存在的東西。

我們进一步研究刘先生所謂出于人类所共有的本性的感情是什么，他曾举出“春秋”为例，他說，“春秋到底寄托一点什么感情呢？照普通看来，只能說是一种赏善罰惡的感情。但是其中还有

‘正統感’与‘正义感’，也是很伟大的感情。”（以上引文见“历史論”四九至五〇頁）“春秋”时代的社会是阶级社会，在阶级对抗性的社会里，所謂善与惡、正統与非正統、正义与非正义，难道不是从統治阶级的立场来看的吗？这类感情可以作为超阶级，超时空和普遍存在的東西嗎？我不愿意在理論上就这种問題多費笔墨，我可以举刘先生本人的这类感情的实例来作具体說明。刘先生把中国过去反抗外族統治压迫的富于革命精神的人民大众，加上表示他自己个人感情的称号，如“发匪”、“擒匪”之类，把那种为着达到革命目的而組織的秘密会社如“白蓮教”之类称为“匪教”。（见“历史論”一一至一二頁，又见一七六頁）这是刘先生本人的出于本性的“善恶感”、“正統感”与“正义感”的具体表示！先生，这种感情是剝削阶级的感情，并不是劳动人民的感情。它是打上阶级烙印的，不能說是出于人类所共有的什么本性。刘先生时常喜欢談人性，理性，这里我只是举个例子，請刘先生一隅三反，深入分析一下。同时还要郑重指出：在历史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发挥这类感情，发泄这种心中积郁，就是不滿现实，发牢騷，也就是在思想战綫上对人民群众发动进攻。这种感情并不是什么伟大感情，而是被消灭的剝削阶级的沒落感情，由于刘先生站在剝削阶级的立场，抱着唯心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看事物看問題，才流露出这种情感。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刘先生对古代史料任意解釋。由于他主观肯定从前的历史作品，大半取材于民間傳說，这种傳說大部分是出于民族集体想象；由于他主观肯定“古代史事，往往同后世的习惯不相合，其間要費掉历史家的心思去涂飾，使近于情理的地方也是不少，”（见“古史考存”三一八頁）于是他对待古代史料采取“姑妄言之，姑妄改之”的态度。他在他所著的“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論”的“緒論”里把这种任意解釋史料的方法大为吹嘘一番，敝帚自珍，說成好象独得之秘。他說，“古代人用想象摆布事实所構成的历史，积久之后，这些材料，在历史家看来，又是一种可保存的史实。从这些材料里分析出从前人集体想象所代表的事实，于是可以推到古人生活底真相。”又說，“这一种方法是从前的中国历史家所不留意的”。这种方法到底是怎样的呢？一句話說，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任意解釋古代史料。他的“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論”一書，也就是他用这种所謂方法研究問題的示例。他在这本書里，任意用他自己的意思解釋古器物里面的文学和古書里面的詞句，从心

所欲，无往而不利，結果是怎样呢？从概念到概念，在故紙堆里兜圈子，团团轉，把人引入五里霧中去。他越是多举例，使人越觉得糊涂，越发不知所云。我随便他这本书里举一个例來說一說：“史記”“大宛傳”里用“行國”这个名詞來指稱那些隨畜轉徙的游牧部族，用“土著”这个名詞來指稱那些从事农业过定居生活的部族，这是没有什么疑義的。刘先生见到“易經”“謙”卦上六爻辭有“利用行師征邑國”的話，和“无妄”六三爻辭有“行人之得，邑人之災，”的話，說“易經”上所說的“行師”或“行人，就是“史記”上的“行國”；所謂“邑人”或“邑國”就是“史記”上的“土著”，把不同时代的名詞这样等同起來，已經有問題。他又看到“訟”卦九二爻辭有“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的話，他想到：“‘邑人’如果是氏族組織以內的人，何以會逋逃呢？”因此，他認為“邑人”的意義，最初必另有所指，于是他的妙想天開的解釋出來了，他說：“邑字象一人蹲處之所，其字与‘印’字有相連帶关系。“印”即古文“抑”字，在甲骨文里作，与“孚”字从“爪”从“子”的意義相近。“俘”是后起字，原只作“孚”……“邑”字，“抑”字声同，“抑”字“孚”形同，这几个字是出于一个根源”。經過这么多轉折，还未能使“邑”字等于“孚”，他就下一个論断：“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等于說“歸而逋其孚虜三百戶”，把“邑人”說成等于“俘虜”了。（見“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論”一二至一三頁）刘节先生的方法就是这样的。結果他写了一本十多萬字的著作，还没有把中国古代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图腾与氏族的关系說清楚。刘先生讀書不少，引用的資料也不少，可是由于他的立場观点方法不对头，結果陷入泥潭，越陷越深，不但没有办法把問題說清楚，甚至他連自己也莫名其妙。

由此可见，因为刘节先生的立場观点不对头，

他的方法也同样是錯誤的，反科学的。

## 四 結束語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刘先生自以为颠扑不破的史学理論与方法，根本是为剝削階級服务的、反科学的、站不住的东西。在我們的社会里，由于資本主义生产資料私有制的消灭，社会主义生产資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成長，我們新的社会經濟基础已經形成和巩固起來。刘先生的思想是旧社会上层建筑的残余，和我們新社会的經濟基础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不可能为它服务的。假如刘先生始終要保殘守缺，坚持錯誤，反对真理，象毛主席所指出那样：“至死不变，愿意帶花崗岩头腦去見上帝”，甘于自暴自弃，那是刘先生自己的事情。不过，我們也要知道，在我們的社会里，人是作为一个生产者來生活的。在各个部門的社会生产中，人不可能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互相影响的。隨着人民公社的成立，生产單位的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在这种情况之下，特別是一个大学教授，身为人民教师，直接負教育培养青年的責任，一言一动都可能发生深刻的影響。立場观点不对头，思想有問題，絕不能作为个人的問題来看待。在青年中灌輸唯心主义的毒素，宣传反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是直接毒害青年，这样做不特談不上貫徹我們的教育方針，而且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帶來直接的危害和破坏，这就使人不能不認為是极其严重的事情，要求非彻底轉變剝削階級的立場，改变唯心主义的观点不可。

社会发展得很快，如果不努力进行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跟上时代，瞬息就会落在时代的車輪后面，形势逼人，不容等待。我們一定要發揮主观能动性，努力进行自我思想改造。愿与刘先生共勉。



# 刘节先生所著“历史論”批判

中山大学历史系四年級学生 姜伯勤 黃宣民

刘节先生所写的“历史論”，收集了他在1940至1944年間写作的十篇論文，是由“正中書局”于1948年5月出版的。正当刘先生写作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不但是从軍事上而且也从思想战綫上向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发动了进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旗帜下的文化掮客如战国策派錢穆等等，紛紛把从欧洲贩运来的直觉論和神秘主义思想，加入到旧封建礼教的复古营壘中去，形成反共的大叫囂。刘先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受到反共主將之一的“玄学鬼”张君勱的鼓励，写出这十篇論文，作为他受到伪教育部供給生活費而写的工作报告(见“历史論”序言)，其公开宣扬唯心主义、反对并且詆蔑馬克思主义，那是不足为奇的。所可惊詫的是，解放八九年了，刘先生思想上还依然故我，仍然把“历史論”中的一套“理論”作为指导他的教学、研究和生活的宝典；在中山大学“中国史学史”講座上，只字不改地大量搬运“历史論”中的陈腔濫調。为了保卫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革命紅旗，清除这本书所起的影响及其在历史教学上的流毒，我們認为有必要对这本书进行批判，揭露其理論上的荒誕性和政治上的反动性。

刘先生在这本书中也搬用了西欧沒落的资产阶級哲学，使之和腐爛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級反动哲学結合起来，成为反动同盟。其中从黑格尔到董仲舒，从孔德到道家，真象一个卖破爛的杂货攤子。但是，概括起来，他的主要論点不外是：

第一，在世界观上，他是客观唯心主义者，还帶有浓厚的“目的論”“物活論”的色彩。他說：“宇宙間一切現象都是宇宙意識的表現。…本質上涵有秩序性……是一套无穷的理則。”(117頁)从宇宙到人类，在他看来是“层創进化”的一个“生命之流。”(195頁)

第二，在历史观上，他主張“理性决定历史”的唯心史观。他說：“人类意識的发展便成为人类的历史”，历史“无非是理性同蛮性的竞争，理性代表人，蛮性代表自然。”历史的“趋势是理性逐漸能宰制蛮性的經過。”(頁1—2)

第三，在政治观点上，他极力贊成非希特、黑

格尔等人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且歌頌蔣匪介石“国字是一个有生命的超于一切的集体組織”的反动說法，誉之为“近代式的国家观念。”(99頁)

不待多說，这些論点是和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这些从反动派的陈旧武庫中搬来的貨色，久已受过馬克思主义者的严正批判，这里我們只要扼要分析刘先生的基本主張，并且着重指出他写作本書时的为反动政治服务的“用心”，也就足够粉碎他对馬克思主义的进攻了。

首先，和刘先生以及所有目的論者的意見相反，科学証明了宇宙本身并不涵有甚么目的性、秩序性，並沒有先于人类而存在的“无穷的理則”。从达尔文进化論发表后，目的論早就不得不宣告破产。刘先生苦心地想要弥縫生物学上鉄的事实和他的世界观的矛盾：“自然的历史本是全部协调的，无所谓矛盾。当然，牛羊把草吃掉，飞鳥把昆虫吃掉，你能說不是生物界的矛盾嗎？但是……自然的主宰，並沒有生了牛羊以后，就把草消灭掉；更沒有出现飞鳥之后而蕩弃昆虫，一切还是以自然为主宰，并行不悖。”(118頁)刘先生以一个宣教师的口吻，把“自然”“主宰”下的世界描写得伊甸園般的美好，可是，它經不起科学事实的考驗。古生物学告訴我們，不知有多少种生物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灭絕了，甚至有些由于盲目过分发展而灭絕的，如鸚鵡螺因殼長得太重而灭亡，有些恐龙因角倒長到腦袋中去而灭亡，刘先生怎样来解释这些事实呢？“主宰”“理則”“全部协调”到那里去了呢？

同样，和刘先生以及所有“物活論”“生机論”者的意見相反，科学証明宇宙并不是甚么“生命之流”。絕大多数的天体是絕對不适合生命的存在的，在宇宙发展的历史上，也有很長很長一段時間根本沒有生命，刘先生或許会重复費希納的濫調：“地球也有精神，否則它为甚么会活动？但是这种企图混淆物質运动的高級形式和低級形式的說法，只是一种詭辯。任何有常識的人都不会認为石头或糞污是真正有生命的。

刘先生所以坚持这个站不住脚的世界观，是为了维护他的思想系统。从“宇宙意识”到“人类意识”再到以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中心的“民族心力”（1541—55页），从“宇宙是生命之流”到“国字是超于一切的有机体”，这是有一贯的联系。唯心主义世界观是唯心史观和法西斯政治思想的基础。从五四运动以来，吴稚晖、陈立夫等国民党反动头子一直宣扬“漆黑一团”、“唯生论”等等生机主义的反动世界观，在它已经第一百次被驳倒后还第一百零一次改头换面再提出来，也正是为了同样的原因。

其次，刘先生主张“理性决定历史”“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意识的发展”，这是和黑格尔主张历史为“绝对精神”的体现的说法相同的，刘先生认为自然代表蛮性，也类似黑格尔在“精神哲学”阶段自然是精神、观念的堕落的说法。社会科学和人类历史都已经雄辩地证明，和刘先生的见解相反，脱离物质、脱离人脑的“绝对精神”或“人类意识”是不存在的。刘先生追随着黑格尔，把人的精神，意识夸大了、绝对化了，把原来是由物质派生出来的精神夸大为超于物质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并且把它看成为自然和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人类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物质财富的历史，是物质财富生产方式更迭的历史，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决不是“人类意识的发展”。人类的知识也决不是由于“理性”（上帝）的赐予，而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中的产物。刘先生企图把因果倒置过来，强调“经济建设也是人类心力对于天然力的征服结果”。（页8）我们要问，如果真如刘先生所言“宇宙意识”和“人类意识”可以支配人们的生产活动，为甚么“意识”“理性”或“心力”只能给原始社会的先民以石斧，而不使它们直接得到机器呢？

值得注意的，刘先生高高挂起“理性”的招牌，我们有必要查看一下他在这招牌下面卖些什么货色！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维护理性的，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示我们，理性的认识是认识逐渐深化的运动中的第二阶段，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而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所以理性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是有重要作用的。在刘先生写作这本书的期间，中国思想界的斗争，正表现为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拼命鼓吹直觉论和神秘主义，掀起反理性主义的逆流，提倡盲从迷信，宣扬宗教信仰。马克思主义者则坚决和这一股逆流斗争。正当这个时候，刘先生

打着“理性”的旗号来到战场上来，但是，检查起来，他所标榜的“理性”原来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只是用哲学名词来打扮一番的“上帝”，完全是不可捉摸的东西。如果要来捉摸，那只有乞灵于宗教：“这全部自然史的主宰，可以说是天，也可以说是神，乃至于是道，都一样的”（117页）。真是“道可道、非常道”，刘先生的“理性”，最终竟可以等同于“神”，这就和我们一般所用的理性有完全不同的涵义了。这样，已经揭露了刘先生的历史观归根到底要跌入僧侣主义的泥坑，而和当时反理性主义的论客们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刘先生正是这一阵营中打着“理性”招牌贩卖反理性主义货色的推销员。刘先生曾经攻击苏联采用唯物史观是“一种宗教精神”（99页），其实宗教迷信的倒正是他自己。

另外，刘先生又攻击“唯物史观派……否认人类有所谓心灵生活”（14页），这也是一个已经生了锈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不是取消人的精神活动和其对客观的作用，相反，恰当地说明和重视这个作用，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旧的唯物论的重要分野之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存在决定意识”的大前提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且由此树立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很显然的，轻视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主观能动作用的恰恰正是刘先生。他在鼓吹“宇宙间一切活动的主宰，……就在我们的心里；……宇宙的焦点就在我们的心中”（195页）的时候，大概自以为很够重视人的“心灵生活”了吧，但是，他所说的“我们”实际上只包括少数统治集团的人物，对广大劳动群众他是异常轻蔑的，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是一笔抹杀的。他转引英国反动史学家陶庶彭的话说：“人类大多数是浑浑噩噩的，缺乏创造能力，少数天才若不拉着大群跟着前进，他们就会落伍。”（页2）试问大多数人类的“心灵活动”，其作用在那里呢？

宗教迷信和英雄史观结合起来，发展到极峰，不能不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刘先生歌颂菲希特的民族主义，甚至称誉蒋匪的“中国魂”，都不是偶然的。连资产阶级民主和个性解放，都在他攻击之列。他说：“英美法三个国家，……个人主义非常发达，……影响到国家的基础。在事实上，法国已经受到这种思想的害……所以欧洲法西斯思想盛行，原因在此。”又说：“德国人受了菲希特、黑格尔一班人的鼓吹之后，其表现民族性的力量，可谓真能超出于其他民族之上。”（99—101页）这

竟是正面贊頌法西斯了。

从这样的反动政治观点出发，刘先生对革命和阶级斗争都竭力反对。他根本否認阶级的存在根本否認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开化的、“文明”的、有“理性”的人，一种则是未开化的、野蛮的、代表“蛮性”的人。这种划分，实际上是为剥削阶级辯护，所謂历史的趋势是“理性宰制蛮性”，无异于說历史就是剥削阶级統治劳动人民。这样把人类的不平等說成是由于文化程度的关系，这是欺騙劳动人民的說法。刘先生又害怕揭露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主张历史家应该致力于减少人类的矛盾，也就是說要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調和”社会矛盾。他反对阶级斗争，更拼命反对革命，說这些都以“蛮性”为基础。他說：“明末张献忠、李自成的屠杀民众，……以及晚清的洪扬之乱，象这样的大屠杀，史不絕書。但社会上的习惯改过来沒有呢？可见社会的改良，若用破坏的方法，是以蛮性对付蛮性，其收效仅及一时，而流毒至于万世。”（166頁）这段話把刘先生对

革命的深惡痛絕，可算表露无遺了吧？

綜合來說，不論在世界观、历史观抑政治观点方面，我們已經指出了刘先生的思想不仅是唯心主义的和反对馬克思主义的（这两点刘先生是公开承認的），而且从“历史論”所表现的論点看来，还是反科学、反理性主义、而为反动政治服务的。对后面这一点，刘先生一直是沒有充分認識的，所以他才在解放八年后的整风运动中，声称“唯心主义是我大半生安身立命之所在，抛弃了它会使我进退失据”，而且一直認為自己是超政治的，是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我們認為，不能恰当認識自己的过去，对刘先生的进步是一个大障碍。整风以后，刘先生作过学术上自我批判，我們欢迎刘先生的进步。但是，仍然有帮助刘先生进一步認識自己过去思想的必要。作为听过刘先生“中国史学史”課程的两个学生，我們希望这篇文章也能对刘先生的思想改造，有所帮助，这是我們批判“历史論”的一个附帶的目的。

## 广州市举行工人、农民学哲学心得座談会

工人、农民、小学生能不能学好毛主席著作？他們学了毛主席著作，对工作和生产能否起推动作用？十一月四日在广东科学館举行的一次工人、农民学哲学的座談会上，大家的发言，对上述問題都給予肯定的答复。

这次座談会是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和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有工人、农民、街道居民、大中、小学生、大学教授和有关业务部門的干部共一百余人参加。在座談会上发言的有工人黄垣、赵德仁，农民顏永如、李炳坤，街道居民尹凤初、六年級小学生陈大任等六人。

新中国机器厂化驗工人黄垣談到前些时候，工厂党委要他帶队建爐煉鉄，又要不能影响化驗工作，心里很矛盾，学了矛盾論以后，他認識到矛盾有主要的和次要的，煉鋼鉄是当前主要任务，一定要讓鋼鉄元帅升帳。这样，他就决定日間建爐为主，晚上搞化驗工作，結果两不误、齐做好。他在会上很兴奋的說：“我只讀过三年書，初时听到学哲学，很多顧虑。现在学了，帮助我解决生产問題，就越学越有味道”。

三元里人民公社三元大队党总支書記顏永如在座談会上暢談該大队的社干部和社員学习哲学的經驗。他們学过辯論法后，知道看問題要有全面观点，大破本位主义思想，把整个大队七百多主要劳动力，抽調一半去支援流溪河水利工程，而生产又並沒有受到影响，过去經常不能完成每日蔬菜上市二万斤的任务，现在每日上市的蔬菜达三万斤以上。

哲学家、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杜国庠同志在座談会上講了話。他說，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已全面鋪开，现在要注意逐步加以提高，加强輔導。解决提高和輔導的办法是自力更生，运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报的办法来互相幫助；同时还可訓練一些进步較快的人作輔導骨干。他又認為：根据实际情況來談理論，就会使抽象的哲学名詞充实起来；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自觉的学好理論。（良）

# 广州市郊三元里农民学哲学的收获

赵 一 之

有着光荣传统的三元里的英雄人民，站在农业生产的前列，同时也站在理论学习的前列。搞生产，争丰收；学理论，用理论，是他们近来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一边做，一边学；学得好，做得更好。在不断的工作和不断的学习中，生活面貌和思想面貌也随着焕然一新。

早在9月中旬，三元里乡党支部接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消息，立即酝酿布置学习。他们知道毛主席的革命理论指导农民翻了身，当了家，做了主；毛主席的著作是革命理论的丰富源泉；农民要跟着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奔向共产主义社会，就必须学会掌握而且学会运用这一理论武器。但是，这里的农民大多数还是在不久以前的几个月才脱离文盲状态。要学，如何学？这是一个问题。

办法终于被他们想到了：由党支部里选出几个理论学习辅导员，做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向导和先锋。辅导员务须熟悉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做到随时随地能够运用，这个要求由辅导员的突击学习达到了，于是很快地在9月20日成立有18个学员的哲学学习小组。论文化程度，这些学员大多数还只等于初小二、三年级学生；最高的也不过高小程度；还有几个自己谦称还是文盲。但好的是：他们大多是生产队长，实际经验很丰富，从土地改革和大生产中锻炼出来的，有些人没有参加学习前就有学理论的要求。中队长李炳坤领导一个中队常常在生产中遇到很多问题，自己明明知道有些社员把问题看错了，可是因为理论水平低，往往不能拿正确的道理说服对方，即使说也是结结巴巴的两、三句话就说完了；有时加上态度生硬一点，实际收到的效果恐怕也要打个折扣。这时他听说有理论学习，欢喜得什么似地，立即报名参加。生产大队干部何佩锐感到好几年没有学习，以致思想有时跟不上形势的发展速度，也是积极愿意参加学习。18个学员要求学习的动机虽有所不同，但对学习的迫切要求是一致的。

学习小组的成立只是在学习道路上迈开第一步，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学是要学，但是学得好

不？许多不必要的担心都提出来，辅导员及时掌握了大家的思想情况，注意从破除迷信，打破神秘观点入手，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了一次大辩论。首先大鸣大放，让大家尽量暴露思想。思想是形形色色的：有的说，学理论可能妨碍生产；有的说，学习是好事，但文化水平低，恐怕学不进去。党支部负责同志意识到这次大辩论就是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第一课，抓紧机会，以毛主席的实践——理论——实践的哲学思想教育农民。

辩论开始了，问题集中在能不能学好这个焦点上。首先，让那些不正确的思想全部暴露，然后进行辩论。在辩论前让大家弄清楚：农民学哲学不是象旧式大学生那样关在书斋里、埋头在书本里那样学，而是结合实际从实际中去学习理论，边学边用，这样能不能学好？社员李祥光认识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辩论时说：“过去的生产问题，经过党在理论上指出它的意义，我们就能跨进一步，把生产搞好；如果不经过党指出问题，就会你有你乾坤，我有我的岁月，就会迷失方向”。他弄清了理论是从实践出来的，只要理论能够联系实际，就不但不会妨碍生产，而且可以推动生产。社员戴登听了，心里恍然大悟，举了个实际事例加以证明，他说：“过去第一次推行小株密植，因有人怀疑受到了影响，不能实行；积肥运动也曾搞不好，经过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用党的政策在理论上进行分析批判后，群众很快就被发动起来，结果小株密植和积肥运动也很快就推开了。”对没有文化能不能学理论这个问题，社员罗球说：“理论是实际中的道理，就一定能够学得好。过去我们摘文盲帽子，用不到多少时间，这样好学的理论，相信比文盲帽子还容易摘。”大家认识了实践——理论——实践这一普遍规律后，都感到日常生活和生产工作中处处都有理论，都有哲学，解放了思想，打破了学哲学的神秘观点，学习的情绪因而提高了一步，能够学好的信心也随着增强了。这18个学员从此变成了学习的骨干，在他们的推动下，很快地便有100多人，聚集在学习这朵耀目的红旗下。

在三元里农民开展理论学习的时候，三元里人

民公社也正式成立了。农民对人民公社的認識是不一致的。有些人对房屋归公社和大农具、多余农具折价及生产資料公有化等問題想不通；有些人对人民公社实行半供給加工資制想不通，認為自己劳动力强入了公社收入减少，吃了亏；而劳动力弱，孩子多的，占了便宜。摆在理論学习的面前是这样一些实际問題，能否解决这些問題是学习上的一个大考驗。

他們还是采取了大鳴、大放、大辯論的方法。在人数比前增多的辯論会上，对房屋及生产資料公有等問題，李炳坤通过回忆对比，从自己过去做雇工、牧童、学徒受飢餓和失业磨折的情况，联想到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幸福生活，便懂得自己今天有房屋及生产資料等等，只是因为过去思想进步，斗争坚决，生产积极；如果现在拖着个私有制残余的尾巴，不跟大伙兒办好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这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就是倒退，从这里他进一步联想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認識到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目前利益要服从長远利益。大家就李炳坤提出的問題展开学习，最后明白这就是毛主席著作所昭示的哲理；看問題应从全面观点和发展观点出发，不能从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問題。

到这时，三元里农民算是打开了哲学的大門。原来毛主席著作里所說的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經過学习，他們在毛主席著作中揀取理論武器去解决实际問題。实行供給制劳动力强、人口少的是不是吃亏呢？望崗大队学习小組一个辯論会上，社員叶卓新提出了肯定的意見，对另一社員黎錫开說：“你們孩子多，做手少；我做手强，吃的人少，我不是要給你养家口嗎？”錫开听了不服气，也反駁道：“现在你多出点力，將來我的孩子長大了，还不是又要养你。”两种意見爭持不決。劳动力强的認為目前吃亏是定了的，將來能否捞回本，好难說。孩子多的認為目前費力撫养孩子要吃亏；將來孩子大了去养人，又算是吃了亏。

就吃亏不吃亏的問題，在几个生产大队的学习会上都展开过辯論。发言的人很多，社員鍾新发的意見是比較地能够取得大多数人的同意的。他这样說：“这不是誰占便宜誰吃亏的問題，而是要不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問題，过去高級社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比解放前的确好得多，对发展生产也有很大好处；但劳动力强的生活好，劳动力弱人口多的生活就差一些。现在入公社，吃飯問題由社解决，生活相差不会很远，这是一条共同富裕的通向

共产主义的道路。”真理愈辯愈明，大家都認為計較吃亏与不吃亏是不对的，现在办人民公社應該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风格来处理問題，不能一籌黃历看到底，用老眼光看新問題，社会在向前跃进，人的思想也应跟上去。

思想上解决了問題，大家都向共产主义的大路上輕装跃进。再沒有人为农具折价等問題在背后唠叨了；劳动力强的人，在劳动中也平添了干劲，人民公社日益巩固。人們随着体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也感到毛主席著作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学习它，掌握它，就能无往不胜。

的确，三元里农民已学会从实际問題找寻理論又用理論去解决实际問題。例如，在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一段短时期，生产搞得不够好，有人在辯論会上認為这是因为公社抽調了一批人去炼鋼和去流溪河搞水利，因而劳动力不足；有的人把劳动力和生产情况計算一下知道劳动力是够了，觉得問題主要是公社沒有发工資，社員沒錢理发、吸烟，所以生产情緒不高。大多数人也不同意后一种看法，把公社成立后社員的实际收支算了个細帳：吃飯住房不用錢，由公社包了下来；吃菜和看病都由公社統一登記办理，不用出現錢。零用嗎？9月份公社发了两次預支款，是足够理发和吸烟用的。社員戴登找出了問題的关键，他說：“现在說生产情緒受錢影响的人，都是資本主义思想在作怪。”有人还举1957年的事为例，那时分配多积累少，社員手头寬裕，就到广州上茶楼，看大戏，不出工，生产自然是搞不好，后来抓紧了思想工作，生产积极性就随着提高。于是，大家得出了一致的結論，認為主要矛盾是思想上拔白旗插紅旗的問題，只有加强共产主义教育才能解决。事实果然証实了这个道理。10月1日前，通过思想教育，发动群众搞好生产，及时供应了广州市民欢度国庆节的蔬菜需要；并多抽調了一批人去支援流溪河水利工程，在竞赛中得到三次“上游”“紅旗”獎。

学理論促进了人民公社的巩固，推动了生产的进展，现在，三元里瀰漫着浓厚的学习空气，許許多多的人知道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大好处，都自觉要求学习。学习的人数不断增加，不到两个月，由一百多人增到一千人一万人，目前，参加学习的人已达二万余；整个人民公社共有18間紅專学校；公社分別在三元里、前途、望崗、远景、跃进等5个营建立5个学习小組，准备按小組提出实际問題进行辯論，在原有的基础上繼續学习再学习。

# 韓愈思想批判(上)

杨荣国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唐代安史之亂前后的社会經濟情况:

公元前六二四年——唐武德七年——李唐統治者施行了自北魏以来的均田制<sup>①</sup>。虽然由于到了李唐时,李唐掌握的土地就益发不够多,故施行的益加不彻底,但总是施行了的。

这个制度,实际上政府为大地主,它的实施,是在于把农民束縛在土地上,鞭策他們生产,提高农业的生产力,从提高农业生产力中来巩固統治者的經濟权力,从而巩固統治者的政治权力。可是虽是如此,但在隋末的統治者大肆浪費民力,破坏經濟生产,因而引导階級矛盾尖銳化,人民群起反抗,在这情势下,这一均田制的实施,对于收拾人心,緩和階級矛盾和提高农业生产力,确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一面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另一面,因隋末运河的开辟,引导水路交通的方便,如王謙所說:当时“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轉運使岁运米二百万石,以輸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也。”<sup>②</sup>又加上国际路綫大通,陆路从敦煌可达中央亞細亞,海路經南洋可达波斯及阿拉伯,因而工商业亦呈繁荣的景象。在这一点上,韓愈亦有所反映,所謂“四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輪,府西三百里,候館同魚鱗。”<sup>③</sup>說明工商业发达,故沿途旅店有如魚鱗一样的多。

而商人从經營工商业致富中又購買土地,进行土地的兼并;所謂“良田收百頃,兄弟犹工商。”<sup>④</sup>另一面,貴族官僚又倚勢掠夺和霸占,致“开元以来,不为版籍,”除“丁口轉死”外,“田亩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时;”<sup>⑤</sup>这样,均田制便逐漸破坏,又經過安史之亂,更破坏无余了。所以陆贄指出“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sup>⑥</sup>了。可是在这“田亩換易,貧富升降”的当中,除了农民对地主的矛盾日趋尖銳以外,皇室貴族,豪門大姓和商人,新土地所有者之間,亦呈对壘状态——換句話說,这就是身份性地主与非身份性地主之間的矛盾。因而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認為“朝廷显官,須公卿子弟为之。”至于所謂“寒

士,虽有过人之才,但他們不“熟朝廷間事,台閣仪范,班行准則,”是以不能胜公卿之任<sup>⑦</sup>,但后者是接近于平民的;至于前者不仅与平民无緣,且因安史以来,“兵难游臻,天子播越,亲卫戎柄,皆付大閹”;——实际掌握了軍政大权,故对大閹多所依附,他們只是“班行备員”<sup>⑧</sup>所謂“痴書生何敢杖杀禁軍大將?”<sup>⑨</sup>于是联合起来,欺压平民——包括商人和新土地所有者,“橫征百出,”“肆毒于外。”<sup>⑩</sup>不仅有超經濟剝削的間架除陌等稅,更有由宦官所控制的欺压平民的所謂“宮市”。

另一方面,均田制的破坏,說明政府所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經濟控制的权力削弱,同时又在这制度破坏的过程中,成長了为地主所領有大小庄园;这一来,自然便利了地方势力的发展,而形成地方在表面上受中央領導,实际上成为一切权力为藩鎮所掌握的割据局面,而不时地和中央相对抗,当时,一个地方的节度使,在他的区域内,他不仅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

①旧唐書食貨志上卷:“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頃,丁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賦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又据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稅上:“(武德)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報定均田賦稅。”

②唐語林卷八。

③韓昌黎集卷四,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涂中見寄。

④云溪友議卷下。

⑤赵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十間架除陌宮市五坊小使之病民条。

⑥陆宣公集卷二十二。

⑦见旧唐書卷十八武宗紀会昌四年末段及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李德裕語。

⑧唐語林卷八。

⑨通鑑紀事本末二十三宦官弒逆。

⑩廿二史劄記卷二十間架除陌宮市五坊小使之病民条。

賦：①有时，还“自罢文武將吏，不供貢賦。”②甚“或父老、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將吏，号为留后。”③这局面是十分严重的。

同时随着割据局面的形成，中央对地方的用兵，和地方对中央的反抗与掠夺，致賦役频繁，当时度牒为僧的可以免除賦役，如是許多人为了规避“王徭”，故“戶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发”；④即使有资产有土地的，亦为了“影庇资产”⑤都“出財依势”，“尽度为沙弥。”⑥因而社会劳动力大大减少，根据記載：当时“商賈僧道，不服田亩者，十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⑦这一来，自是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当时政治的社会的总的情况。

韓愈出身在这样一个时代（768—824），他的家庭，亦不是什么有“名位”的，且他“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这可见他是屬非身份性地主阶级而不是豪門貴族。因而反映在他的思想上固有若干的人民性与进步性；可是由于这一阶层的有他两面性，同时又由于他养于从父兄——韓会，会就是依附那“納受賍私，賈鬻官秩”“及得罪，行路无嗟惜者”的元載的。⑧从父兄所給予他不良思想的影响，所謂“苟容躁进，不顧其身，”所謂“祿仕而还，以为家荣，”⑨——都是从父兄所貫輸給他的。因而，他虽倡导文以載道，文章要有思想性，（自是封建的思想）要言之有物，但在政治的傾向上他是依附閹宦势力，而与当时进步势力相对立，因而反映在他思想上，他倡导客观唯心論，是客观唯心論思想。

### （一）韓愈的所謂“道”——是精神的东西。它是“客体的实在”。

清人全祖望說：韓愈“作原道，实闡正心誠念之旨，以推本之于“大学”；而李翱論复性，則專以羽翼“中庸”，“发明至誠尽性之道。”⑩

全氏的話，是把握住了韓愈文章的主旨，分別了两家思想的意图。

这里，只就韓愈的思想來說：

明末张杨园說：“昌黎原道篇引大学至誠意止，不及致知格物，为无头學問。”⑪是的！“格物”一詞，如依朱熹之說，是在即物穷理；“夫即物穷理，非即实事求是”嗎？⑫既“格物致知”为实事求是，而韓愈只講“正心誠意”而离开了“格物致知”自为无头——亦即无基础的學問。且这‘格’

字如以之作为書益稷篇“格則承之庸之”的‘格’字，依据宋人袁燾的解释“学者变格也”⑬按“变格”亦即“变革”如此解释为“变革”的話，則“格物致知就是从变革事物中而获得的知識——这正是合理的！而韓愈談“正心誠意”而离开了它，更自說明为无头——无基础的了。

当然，韓愈离“格物致知”而“言”正心誠意，自不是偶然的！他在原道篇明白地說：其所以要談“正心誠意者”是“將以有为”。——是有他的企图。

当时，如他說：“文致未优，武剋不剛，孽臣奸隶，蠢居菑处，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于代，以祖以孙，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⑭——这就是藩鎮割据和国家不統一。因之，他希望到一个“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⑮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統治的局面。——这个也就是他的所謂“道”。

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天下逐渐的分裂于方鎮”致使人民“常罹兵革之苦”不能“得安耕牧”。⑯不能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因而需要有一个統一的局面，这要求和主张不能說是不好的，而是很好的！可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統一于什么基础之上——統一于非身分性的新兴势力的基础之上，还是統一于身分性的大閹所控制的旧势力的基础之上——二者是有所区别，因为比較能改善人民生活，能引导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①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唐节度使之禍条。

②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三唐紀三十九。

③見同上。

④旧唐書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傳。

⑤見同上。

⑥唐會要卷四十八。

⑦資治通鑑二百三十八唐紀五十四李吉甫語。

⑧旧唐書卷一百十八；韓会之依附元載見河南邵氏聞見后录卷八。

⑨韓昌黎集卷二十三祭郑夫人文。

⑩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編卷三十七李习之論。

⑪楊園先生全集卷三十七初學备忘下。

⑫見漢學商兌卷中之上。

⑬見所著絜齋家塾書抄卷三。

⑭韓昌黎集卷三十九潮州刺史謝上表。

⑮同上卷三十一原道。

⑯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唐节度使之禍。

后者掌握了当时军政大权，他们之腐败，除了“索贿赂，酿祸端”之外，①他们又设有所谓“宫市”，强买强卖，欺压平民，又“纵五坊小使”，敲詐勒索，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富商，亦假所谓军需名义，曾规定“商贾本身过千万者”要“贷其余以济军”“又质库及储粟者”亦要“四贷其一”②致“民不聊生”，“恨詈之声满天下。”③这样看，如果统一在这班阉宦所把持的腐旧势力的手中，只会带给人民以更大的灾害，决不会提高人民的生产力。

前者，从韩愈的当时来说，是以王叔文为代表。关于王叔文，韩愈在《顺宗实录》中把他說成是“詭譎多計”的小人；而旧新两唐书的撰列传者刘昫和宋祁不知韩愈的“《顺宗实录》是歪曲史实“不惬众論”的，④反而受其影响，亦是褒阉宦俱文珍而貶王叔文。实际上，王叔文，——他关心民間疾苦，而力图改革当时政治上的腐败，王船山曾指出：王叔文“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兒，貶李实，召陆贄、阳城，以范希朝、韓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紀，”⑤——这一切的措施，正适应了当时非身分性的新兴势力的要求；同时，王所引进的人物，许多都是从新势力中来，——所谓“素卑賤”“人所不信”的，⑥而他们又德才兼备；⑦所以人心快慰！倘统一于这一新势力的基础之上，自是可以稍舒民力，提高社会的生产力。

可是韩愈，一面依附大阉，如他对俱文珍之歌功頌德，說俱文珍“材雄德茂，”“俯达人情”，在俱文珍“偃息談笑”間，就可以使得“危疑以平。”⑧——可以达到国家的统一。如此称赞，可见其依附之深。另一面，从他在《顺宗实录》中，把王叔文說成是詭譎小人，同时又說王叔文当政时，“同官多才俊，偏善柳与刘。”⑨——但这种对柳宗元、刘禹錫的特別维护，正是他们站在一条进步的政治路綫上的緣故。可是韩愈提出抗議，这也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和王叔文他们——这一新兴势力的代表，在政治上是敌对的。既然与进步势力相敌对，則我們知道韩愈的所謂统一，不是从政治改造中求得新的统一，而是统一于那“残民以逞”的腐朽的旧势力基础之上。

关于这，从他歌頌唐宪宗，說宪宗“即位以来，誅流奸臣，朝廷清明，无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刘闢，以收夏蜀，东定青徐积年之叛，海内怖駭，不敢违越；郊天告庙，神灵欢喜，风雨晦明，无不从順，太平之期，适在今日；”⑩按“誅流奸臣，”

即是指誅流王叔文等。他把誅流王叔文等进步势力說成是“誅流奸臣，”說成是“朝廷清明，无有欺蔽，”这不是和以俱文珍为首的阉宦腐朽势力有着共通的語言而一鼻孔出气嗎？并从歌頌这“太平之期，适在今日，”可知他所要求的统一，是统一于那“残民以逞”的腐朽的旧势力基础之上。这不是很明显的嗎？

至韓愈对王伾、王叔文等进步势力之嫉視，自不偶然的。严虞惇曾說：“伾、叔文得政不容引公，而仅量移江陵，故公深恨之，痛加詆訾，并迁怒于刘（禹錫）柳（宗元）諸公耳。”⑪可不是嗎？如李翱所指韓愈之为人，所謂“如元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辭，兼能附己順我之欲，則汲汲孜孜，无所爱惜引拔之矣。”⑫由是而知，他之迁怒柳与刘，就是柳与刘不仅不依附他，且是他的敌对。同时严虞惇这話，从另一方面說，又根据韓愈在詩中的流露，所謂“伾、文（王伾、王叔文）未揃崖州熾，虽得赦宥恒愁猜，”⑬自是王叔文他们早已看穿了韓愈是依附旧势力而不可与图大事的，所以不引以为同志而一同工作，自是必然的！

而王叔文他们之为进步力量，王鳴盛說：“叔文行政”，“本欲內抑宦官，外制方鎮，攝天下之財賦兵力而尽归之朝廷。”这是“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的；⑭且“叔文引用者皆賢，无论刘禹錫、柳宗元才絕等伦，即韓华亦有俊才，陈諫警敏，一閱簿籍，終身不忘，凌准有史学，韓泰有筹划，能决大事，程异厉已竭节，矫革积弊，复无留貸”；历历见諸传，岂小人乎？”至于用范希朝，則新書于兵志已表其欲夺宦者权而不克；于希朝本传更盛称其治軍整毅，当

①同上中数出使及監軍之弊条。

②同上開架除陌宮市五坊小使之病民条。

③同上。

④津南遺老集卷二十二新唐書辨。

⑤讀通鑒論卷二十五唐順宗。

⑥河东先生集卷三十寄許家兆孟容書。

⑦见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九王叔文謀夺內官兵柄。

⑧韓昌黎集外集卷三送汴州監軍俱文珍。

⑨韓昌黎集卷一江陵途中寄三學士。

⑩同上元和聖德詩。

⑪见批顧嗣立韓詩注。

⑫李文公集卷六答韓傳郎書。

⑬韓昌黎集卷三忆昨行和张十一。

⑭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順宗紀所書善政条。



世比之赵充国，且历叙其“安民御虜保塞之功”，①而韓愈把他們說成是詭譎小人，这不仅不伦，自亦表明他和王叔文他們因政治上的对立而仇視之至如何程度。

从以上的分析，益可知韓愈只在于維護那以腐朽势力为基础的政治上的統一；而王叔文他們則反是，他們則力图从对政治的改造中而走向一个新的統一。

第二，“原道”是为他的政治观而服务。

韓愈在政治上是与王叔文势力相敌对的基础上求到統一，——重新树立和加强中央集权政治；但在学术思想上則在从反对当时起着支配作用的佛老思想中，回复和建立起那以儒术为归依的所謂“道統”。——这两者，在韓愈的思想中是互相关联着，形成了整体的一套。

自然，从当时來說，要从反佛老中树立起儒家的旗帜，自有其积极的意义。因为奉事佛老，不仅浪費了财力和人力，——所謂“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为金宝之飾，”②所謂“老少奔波，弃其业次”③——自是影响工农业的生产；同时，在佛老思想的支配之下，致人們的意志趋于汨沒，妨碍了人們对现实的努力。儒家思想自不同于佛老，是較有现实意义的，所以韓愈从反佛老之脱离现实，而树立起儒家的旗帜，自有其进步作用。

可是，值得注意的韓愈虽反佛老之脱离现实，——所謂“欲治其心”，不能“外天下国家；”④而在另一方面，他談儒家思想，又只究心于“正心誠意”，究心于“正心誠意”說是“將以有为”——张杨园說，这是无头的認識——亦即是本末倒置的非真切的認識，佛老之流行，自有其流行的社会基础；不去“格物致知”——不从变革事物，从对现实的努力中而致力于现实的改造，——从当时來說，就应当和新兴势力一道去进行政治等各方面的改革，而求到以新兴势力为基础的新的統一。——不这样，而是离开“格物致知”——离开变革事物以获得認識，以求到“意誠而心正”而不为佛老思想所迷惑，并从而达到政治上思想之統一；这个不仅是徒劳，这样作，显然见到了他是有所意图——亦即是他的所謂要从究心于“意誠而心正”中“將以有为。”

而他的意图，他的“將以有为”是在于：

、在政治上，从反对非身分性的新兴势力中而以閹宦所控制的軍政权力之下，削平藩鎮势力，达到当时政治上的統一，——所謂“当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鉞鉞三权，皆国之元臣，天子所左右；”⑤

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專制局面。因而——

在思想上，自应有所建設——自应有維護这中央集权封建專制局面的一种哲学思想。

因为韓愈原道，認為所謂“道”不是“老与佛之道，”而是尧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和孟軻所传下的“道”。他又为了使这“道”的内容不致为人所歪曲，于是他从学术文化上，政治制度上提出了作为“道”的具体内容应该是：“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米麻絲，其居宮室，”等等，⑥——这一系統的封建的典章制度与封建的道德和它的学术文化。借以維護和巩固这中央集权的封建專制的局面，——使之臻于恒化。

在这前提之下，韓愈認定这所謂“道”——这一观念的东西，自应是客体的！所謂“道与德为虛位，”⑦宋人程頤从称贊“原道”中，但对这话有意见，認為韓愈这话是“乱說”；⑧意思不该提到“虛”，不该說“道与德为虛位，”因为程頤認為“虛”“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无实于理者；”⑨但程頤不曾对韓愈这话理解清楚，韓愈这话的前一句是“仁与义为定名，”就是認為“道与德”是以这“定名”的“仁义”实之的，——所謂“仁义道德，”这样自然是“理”，自然是“实”，而无所謂“虛”了。所以韓愈这句话与程頤的意见并无矛盾而是一体的。既然“道与德”是“仁与义”的“道与德”，那“道与德”是仁义的，自然便是“理”，便是“实”；故宋人杨誠齋說：“圣人之道，非以虛为道德，非虛而曰虛位者，道德之实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天下之物，惟其位之实，是以莫得而入也。其位不实，則虛与实皆得入而居之，惟其有以实其位之虛，則其位不可入矣。”⑩杨誠齋这话，不仅說明韓愈的所謂道德之为仁义的，是理，是实，且更进一步还表明了韓愈的所謂仁义的道德是具有方位的，既是具有“方位”的，

①同上卷八十九王叔文謀夺內官兵柄条。

②唐会要卷四十七。

③韓昌黎集卷三十九論佛骨表。

④同上卷十一原道。

⑤韓昌黎集外集卷三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⑥韓昌黎集卷十一原道。

⑦同上。

⑧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九。

⑨同上書第三。

⑩誠齋集卷八十六韓子論上。

則是客体的了。由是而知韓愈認為這道之原，本是客体的实在。分析起來就是：

從橫斷面說：這觀念的東西——“道”，它是客体的獨立存在；

從縱斷面說：這“道”通過堯舜，中經禹湯文武而具體地體現出來，不僅有脈絡可尋，且是一個永恆的存在。

所謂“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①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諸大聖就是這樣遵循着這一客体的“道”而行事，是天經地義的！

因之，無須“格物致知”，只要從“意誠而心正”中體驗這一先驗的客体的“道”，從體驗中遵循着它而行事就可以。人們掌握了它，“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②因為它是一個永恆性的真理。

從這一分析中，我們知道韓愈認為：這一客体的“道”，對於那以宦官貴族等舊勢力為基礎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給予了理論上的根據。有了這一理論上的根據，不僅抵制了佛老思想之流行，同時，最主要的，誰也不敢“滅其天賞”，誰也不敢“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③倘有敢冒這大不韙的話，那便是得罪了名教——便是“臣罪當誅”而“天王”還是“聖明”。④

所以韓愈的原道，表現上是反佛老之脫離現實中而樹立儒家的旗幟——認為儒家的思想是為現實而致力的思想——所謂“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⑤但在實質上，這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以之來維護和鞏固那以宦官貴族等舊勢力為基礎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

**（二）韓愈倡導性三品說是在維護當時社會的身分性，但其實質，他是肯定人性之為善——這一所秉賦于人的“客体的实在”。**

關於韓愈人性論的探討。

韓愈把“人性”分為上中下三品，說“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下焉者，惡焉而已矣。”⑥並舉了若干歷史人物為例。

他這一論調的淵源，實淵源于孟子中公都子的假設：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⑦

韓愈就把這一論性的意見肯定下來，而分“人性”為上中下三品。

當然，在另一方面，韓愈這時提出人性論問題來討論，而又把人性分為上中下三品，自是有他的時代的原因的。一則當時佛老思想流行，佛以性為空寂，老以性為全真，他們為了性的空寂與全真，故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⑧這個，自是與儒家精神背道而馳。于是他為了樹立儒家在人性論方面的所謂正統，他從反對雜佛老而言性的當中，⑨把儒家人性論復活起來。同時，在另一方面，因為封建社會發展至隋唐時代，那為封建社會服務的工商業有了一些抬頭，因而引導到均田制的被破壞和莊園制的逐漸興起，在這破壞與興起的當中，除農民和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以外，亦出現了新勢力對舊勢力的鬥爭——這就是非身分性地主和身分性地主之間的鬥爭；在前者對後者的鬥爭中，前者關心民間疾苦，渴望澄清吏治，和緩階級矛盾，求到以他們的勢力為基礎的局面新的統一。後者則反是，他們把所握着的權利死死不放，而在在給予新勢力以打擊。在這繁復的鬥爭局面，反映在人性上，自有所謂“為義若嗜欲”的，⑩亦有不是為義而是為利若嗜欲的，所謂“朋交日離謝，存者逐利移。”⑪於是韓愈便從這種表現上給人性以分析——認為人性有所謂上中下三品，肯定社會上的身份性，但從

①韓昌黎集卷三十九賀冊尊號表。

②同上卷十一原道。

③同上。

④同上卷一琴操十首中之拘幽操。又宋代程頤說：“韓退之作姜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程頤的這種稱道，是不為無因的。

⑤同上卷十一原道。

⑥韓昌黎集卷十一原性

⑦孟子集注卷十一告子章句上朱熹注釋指出。按程頤對這點早已指出：“如韓子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上）

⑧韓昌黎集卷十一原道

⑨同上原性

⑩韓昌黎集卷二十六唐朝散大夫玄贊司勳員外郎孔尹墓志銘

⑪同上卷五寄雀二十六之三

他自我的認識上，他認為人性之所以分上中下三品，自不是后天的，而是所謂“性也者，与生俱生也。”<sup>①</sup>——而是先天的。那就是說：人性之善惡，不是为后天的客观环境所规定，而是先驗的本來如此，他并举堯之朱，舜之均和瞽瞍之舜，鯀之禹等为例，來說明性善与性惡的确是先驗的，同时又說明性是有所謂上中下三品的。

这些論点，宋人王安石都持反对的意见：

首先是反对韓愈論人性之为先驗的一点：他說：“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习于惡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习于善而已者”。<sup>②</sup>意即他們之惡与善，并不是什么先天的而是后天的。

自然，王安石的駁斥，是具有他一定真理性的。

只是，我們要知道的，韓愈之所以認定“性也者”，是“与生俱生”，是先驗的，而不是“习非不善”与“习非不惡”，<sup>③</sup>不是后天的，他的意图，就在于，一則从反对佛老所言“性”的当中树立和发扬自承接先圣之道的孟軻以来，所言人性只是先驗的——并闡明人性之为先驗的，是儒家的一脉流传，而又是具有真理性的；同时，从闡明人性之先驗的，是具有真理性的当中，于是所謂人性之善惡，則与那社会制度或統治制度便无关了，便无須給予社会的政治的制度以改造。天性是善的話，所謂“上之性就学而愈明，”只要“扩而充之”就是；天性惡的話，所謂“下之性，畏威而寡罪。”<sup>④</sup>給予以箝制作用，就可以循规蹈矩而不致起反抗，不致有所謂“黃家賊”事件之发生，致“威又不能监制。”<sup>⑤</sup>

根据以上的分析：韓愈闡明人性之为先驗的，是具有真理性的，实际上，这样的闡明，就是便利了当时这一腐朽了的封建統治，証明这一腐朽的封建統治之为絕对的而无須有所改造，因为一切的犯上作乱，是无关于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而是先天的人性有以使之然，善惡的話，只要政府掌握了权力，所謂“下之性”是可以“畏威而寡罪”的。如此說来，王叔文他們之从关心民間疾苦而力图进行当时政治上的改革自是多余的，錯誤的了，故韓愈与之相敌对，在順宗实录中給予王叔文等以种种誣蔑。这个，自不是什么偶然的！从他的人性論中亦见到了他的意图。

而王安石之反对韓愈的人性之为先驗的一点，正因为王安石是末代政治上的改革者，人性既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故要改造人性之趋向善，必先

改造那趋向善的政治环境。

其次，王安石对韓愈既分人性有所謂上中下三品，而另一面又說“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sup>⑥</sup>对这一点，王安石亦有意见：

他說：“且韓子以仁义礼智信五者謂之性，而又曰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岂五者之謂哉？”<sup>⑦</sup>意即这样說，岂不自相矛盾？

王安石指出这点，自是很英明的！因之，我們对这一問題得进一层研究。

韓愈虽認為性有上中下三品，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性也者”是“与生俱生”的，并指出“所以为性者”凡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这样說：人之性是天所秉賦的，这天所秉賦的性是仁义礼智信，这样所謂性，自是善的了。同时，他又認為：“情也者，”是“接于物而生”的，并指出“所以为情者”凡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惡，曰欲。”这样說，情是后天的，是与物相接触而生的。这后天的与物相接触所生的情是喜怒哀惧爱惡欲，如是这就成了惡的根源。

从以上的分析，自又与所謂性有上中下三品相反，而是性为善、惡的根源，便是那“接于物而生”的情了。

其实我們若仔細探討韓愈的“原性”，除善性的上焉者之外，就是所謂中焉者和下焉者，——前者之于仁义礼智信，为什么“——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于四也混”呢？不是前者已接于物而生的七情，“有所甚，有所亡”的緣故嗎？后者之于仁义礼智信，为什么“反于一而悖于四”呢？同样的，不是后者之于那接于物而生的七情，“亡与甚，直情而行”的緣故嗎？

由是可知，韓愈虽分性为上中下三品，虽又从历史人物中証明性是有三品的，虽又批駁了孟軻之道性善，是“举其中遺其上下”——虽是如此，但在實質上，他是肯定人性是善的，而其所以为惡，是由于那接于物而生的情的关系。因而人性之所以

①同上原性

②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八性說

③韓昌黎集卷十一原性

④同上

⑤同上卷四十黃家賊事宜狀

⑥同上卷十一原性

⑦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八原性

表现有上中下三品，實質上亦是那接于物而生的情的关系；性的本身实是善的。

他在實質上是認定人性为性善，而在表现上又分人性为上中下三品，其用意，如前所說，一面是，人性之为上焉者固無論矣，就是中焉者和下焉者亦系天性使然，并非后天有以致之，故无需对后天的客观环境——不論属于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有所改良或改造。另一面，自是表明他的立场的——賢性，他是不禱佛老而言性的。而总的精神則在維護身分性制度，从他的“上之性学焉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的两句話的階級含义之浓厚就明白地显现了出来。

至于他在實質上之認定人性为善：

(一) 他認“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按此，即孟軻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sup>①</sup>的人性本善的說法。又他辟佛老“灭其天常”<sup>②</sup>按天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灭其天常”即礼記东記中之“天理灭矣。”郑玄注此語說，“性犹理也。”人之所以为性是仁义礼智信，則人之所以为性，便是理。

(二) 他認尧舜之道，至孟軻不得其传，“而荀与杨也，又择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sup>③</sup>实际上，他認“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杨雄所传之道。”<sup>④</sup>按此，亦即本之于孟軻的“由尧舜至湯”，“由湯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孔子以后，便“不得其传”<sup>⑤</sup>的以道統自命的說法。

(三) 他肯定“孟氏醇乎醇者也”而“荀与杨”便是“大醇而小疵。”<sup>⑥</sup>故程頤說：“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极好，非得孟子意，亦道不到。”<sup>⑦</sup>

(四) 孟軻辟杨墨，而他辟佛老，隱然自認是先后輝映。

这些，均說明他对孟軻是予以完全的肯定，从他对孟軻的完全肯定中，一壁自是承接孟軻的所謂道統，另一壁自是孟軻之認定人性本善。人性之本善，才是醇乎醇。

韓愈又曾这样說：“且五常之教，与天地皆生。”<sup>⑧</sup>按：“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也。”<sup>⑨</sup>而仁义礼智信，即韓愈的所以为人性者五，即是善性。說“五常之教，与天地皆生”，亦即在有天地的同时，亦即有了这五常之教，于是說来，这“五常之教”是早已客观地存在着；直待有了人类，有了人类若干年以后才被人逐渐发现。

“故尧之前千万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为美也；”——韓愈写道：——“于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为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辞尧，由是后之人，竦然而言曰：‘虽天下犹有薄而不售者，况其小者乎？故讓之教行于天下，許由为之师也。’”

“自桀之前千万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他又写道：——“故龙逢哀天下之不仁，觀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于是进尽其言，退就割烹。故后之臣竦然而言曰：虽万死犹有忠而不惧者，况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于天下，由龙逢为之师也。”

“自周之前千万年，渾渾然不知义之可以换其生也；”——他又写道：——“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藜，逃山而死。故后之人竦然而言曰：虽餓死犹有义而不惧者，况其小者乎？故义之教行于天下，由伯夷为之师也。”<sup>⑩</sup>

按“讓”屬“礼”，所謂“辞讓之心，礼之端也。”<sup>⑪</sup>而“忠”屬“仁”，如“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諫而死，”这是“忠”的表现，故“孔子曰：殷有三仁焉。”<sup>⑫</sup>这里韓愈就“五常之教”中“礼”“仁”“义”三者來說，証明这三者是“与天地皆生，”是早已存在客观世界的，自从有了人类，而又將这种种秉赋于人类，經過若干时候，而又通过一定的人，从他对这所秉赋的种种的善性的扩而充之的当中，“其心則能別是非”<sup>⑬</sup>因而具体地提示了出来，于是人們才知在客观世界中存在着有所謂“五常之教；”——这“五常之教”是客观存在着的，自是天經地义的。

后来程頤曾这样說：“自理（五常）言之，謂之天（客观存在）；自稟受言之，謂之性（秉赋于人之謂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sup>⑭</sup>这話就是韓愈人性論的注释，把韓愈的这一观点从发扬中而体系化。（未完待續）

① 孟子卷十一告子章句上

② 韓昌黎集卷十一原道

③ 同上

④ 同上卷十四重答张籍書

⑤ 孟子卷十四尽心章句下

⑥ 韓昌黎集卷十一讀荀

⑦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九伊川語录

⑧ 韓昌黎集外集卷四通解

⑨ 論衡問孔篇

⑩ 韓昌黎集外集卷四通解

⑪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⑫ 論語微子

⑬ 韓昌黎集卷十六什张借与李浙东書

⑭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伊川語录

## 再論陈白沙哲学

陈玉森 李錦全

“理論与实践”发表了好几篇討論陈白沙哲学思想的文章,我們认为这是可喜的事情。大家各抒所见,把問題辯通辯透,这对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和我国哲学遗产的整理都有所帮助。但我們对聞竣同志的大作(见本刊第七期)有些不同的意见。现在謹提出来就教于聞竣同志。

白沙的“道”究竟是在形气之内,还是“道超形气”?这是聞竣同志和我們意見紛歧的第一点,也就是主要点。聞竣同志认为白沙的“道”是在形气之内,因而是唯物主义的。我們不同意这种說法。

首先,聞竣同志引了“和答王愈先乐用”的一首诗,証明白沙所說的“道”是在形气之内。它的公式是:一、白沙說“春”在形气之内,二、据聞竣同志自己的体会,白沙說“春”即是說“道”,三、因此,聞竣同志就断定:“春”在形气之内即“道”在形气之内。这个公式的錯誤在“春”等于“道”这个大前提不能成立。因为聞竣同志认为“春”等于“道”只是个人的“玩索得之”,是毫无根据的。“春”在形气内,不能說就是“道”在形气内。

其次,聞竣同志还引了“次韵张东海”的两句詩:“道超形气原无一,人与乾坤本是三”来証明白沙的“道”是不能超出形气。据我們的理解,恰恰又和聞竣同志相反。白沙明明說:“道超形气”,怎能硬說他的意思是道不能超形气呢?我們解詩不能毫无根据地把詩的字加多或减少。白沙在这两句詩里,並沒有說:“如果道超形气便无一。”“元”是本来的意思,与“本是三”的“本”同义。它并不是用作一个假設連詞的。那么,我們凭什么来把

这句詩理解为“道不能超形气”呢?同时,更重要的,这詩里所指的“一”究竟是什么?聞竣同志沒有交代。“一”的意义弄不清楚,則这句詩是不能讀通的。要弄清楚白沙所說的“一”是什么,我們最好參看邵尧夫一首詩。邵子“观易吟”道:“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經綸。天上岂有两般义?道不虛行只在人。(伊川击壤集卷十五)白沙的“道超形气元无一,人与乾坤本是三”的“一”和“三”都是本之于此。“一”即天所本以分体用的“一”,它是从人心所起的。而“三”也就是三才,即人与乾坤,这个“三”是“备于我”而别无立根之处的。这个“一”实际上是指太极既判之初的混沌一体,故为天所本以分体用。邵子先天卦图云:“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也。”“启蒙曰:“太极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为一画者也。二、是为两仪,其数則阳一而阴二。”白沙所說的“一”,也即“一分为二”之“一”,亦即“一奇一偶”之“一”,也就是“一画之“一”。这个“一”既是指太极既判之初,有“一”即有阴阳二气。故白沙和邵子一样认为形气是从太极既判之初的“一”发生的。那么,太极未判之前則未生“一”而只是沒有形气的混成一体。邵子“观物内篇”說:“混成一体謂之太极,太极既判,初有仪形,謂之两仪。“是則太极未判,一画未成的太极,就是混沌的东西,它沒有阴阳二气的两仪。这个沒有形气的混沌,邵子和白沙都称之为“道”。邵子說:“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道”是指包括这个混沌东西的。白沙也和邵子一样,故說:“道超形气元无一”,也就是說“道”包括那个未生“一”的,超乎形气的那个未判的太极。我們知道,道家的老子曾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是說:一由道生,道

未生“一”之前本无“一”。邵子接受了道家这种思想影响，并结合周易制定“先天卦位图”。从而形成了他的“道”在“一”先，即“道”在形气之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而白沙则又受邵子的影响。白沙是很崇拜邵子的。他曾说：“只学尧夫也不孤”。如果我们理解这点，那么，白沙的“道”是什么也就可以了。白沙“太极涵虚”诗云：“混沌固有初，混沌本无物，万化自流形，何处寻吾一？”这是说，当混沌未判之时，是混沌无物的。既判之初，始有万化流形，而吾“一”可寻。可见白沙的“无一”即指无形气，他认为道是超形气的。

邵子认为这个道又是心，人心未发之先复归于道。故说“人于心上起经纶”。又说：“先天学心法也。图皆从中起，万化万事生于心也。”（先天卦位图）白沙接受了这种思想，并把邵子的意思加以扩展，认为“一”由“道”起，道由心生，心之未动则谓之诚，而复归于道。故他在“无后论”说：“夫天地之大，万物之富，何以为之也？一诚所为也。盖有此诚，斯有此物；则有此物，必有此诚。则诚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诚，而为天地者此诚也。天地之大，此诚且可为，而君子存之，则何万世之不足开哉！”白沙认为诚是天地万物之本，先有此诚斯有此物，而诚又存于人心之中，这岂不是宇宙精神在人类自我主观的复归吗？我们能说“诚”是物质的吗？所以白沙既认为诚可以开万世，便从而进一步否定世界的真实性。他在“赠人”诗说：“梦亦是真真是梦。”他把梦和真等同起来，于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就完全显露出来了。

再次，闻竣同志又认为：白沙所说的“理”和“性”都是“道”的同义语。这点，我们不反对。但问题在于白沙所说的“理”，“性”，或“道”究竟是否物质性的呢？第一，闻竣同志说：“这个性、理、情在白沙看来，都是客观存在的。”可是问题在于客观存在的东西不一定是物质的东西。譬如说：某种思想是客观存在的。你能说思想就是物质吗？第二，闻竣同志认为白沙所说的“理”，是“当作物质的本质属性来理解的。”然而，物质本质的属性，并不等于就是物质。例如，某些物质的属性是硬的或者软的，而软或硬本身并不是物质。同时，既然是物质的属性，那它就当和物质不可分才对。而闻竣同志却承认白沙所说的那个作为物质属性的理、性、或道，可以寄在“能”中。“能”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闻竣同志有无自己的“玩索得之”的特殊的解释，不过，在一般人的理

解“能”不是物质，而只是物质运动的尺度而已。作为物质属性的理、性、或道，它可以寄在非物质的“能”中，这不是唯心主义是什么？

最后，我们还要和闻竣同志谈谈白沙所说的天地万物和道之间的关系问题。闻竣同志说：天地是有单一的意义。“它是和牛马同数的。天地在中国字的含义，并不代表万事万物，否则，我们习惯见到的‘天、地、君、亲、师’神位，就可以不写君、亲、师了。习惯上指天地，只是指上复下载的这两个东西而已。”这样的理解，我们也是不能同意。我们认为从世界观的角度来说，天地是指自然界，即整个宇宙。它应该包括万事万物。这就是说，万事万物均由天地所发生，也不能离开天地而独立存在于天地时空之外。当然，天地未判之前的太极，中国古代某些哲人是承认它先天地而存在的。但天地既判以后，他们以为由于一阴一阳的矛盾斗争，发展变化，于是天地就产生万物。有天地而后有男女，有男女而后有人伦，这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思想。这一思想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辩证唯物主义也告诉我们：世界是一个物质的统一体，它无始无终地存在着，先由无机物发展而为有机物，再由有机物发展而为有生命的生物。但这些个别物体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如果象闻竣同志那样说世界上的牛或马，或者某些有生命的东西，是超天地的，超自然界的，是与天地同数的，那么，它就必定破坏了世界物质的统一性的原理，那是不可想象的事。可见，认为天地包括万事万物，从这一点来说，倒不能说白沙是唯心主义。问题只在白沙对天地未判前的看法，和他对道心关系的错误见解。所以我们也承认白沙说“天地间一气而已”这句话是有正确性的。白沙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只在于他认为“道超形气”，在天地之先还有精神的“道”。

所以，我们重复一句：白沙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在于他认为“道超形气”，又认为道由心生。而不是在于他认为天地包括万物。反之，认为天地不包括万物，这恰恰又是唯心主义世界观。

## 二

对于白沙所论道心关系问题，闻竣同志和我们也有不同的见解。闻竣同志认为“白沙哲学的道心关系，其实就是主观与客观事物的关系。”我们则认为白沙哲学是“道心合一”的。他是从客观唯心主义走向主观唯心主义。这是闻竣同志和我们意见分歧的第二点。

聞竣同志上面那句話，是說得不完全的。因為他沒有說明客觀事物是從那裏來的，它們是精神還是物質，關係怎樣。如果說白沙所說的道是指客觀的宇宙精神，那麼我們沒有異議。因為客觀唯心主義者也承認客觀事物的存在，他們與唯物主義者在世界觀方面的分歧，只不過他們認為客觀事物是由宇宙精神所派生，認為精神第一性，物質第二性；而唯物主義者則認為客觀的物質世界無終無始地存在着，認為物質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如此而已。所以，聞竣同志既然不能證明白沙所說的“道”是物質的，那麼，無論怎樣詳細論証白沙的心不是道，或者論証白沙認為要專心才能得道，論証道是第一性，心是第二性。如此等等，都不能說明白沙的那些命題是個“很好的反映論。”我們以為白沙的道既是超形氣的，那麼即使白沙主張心不是道，或者主張要專心才能得道，或者主張道是第一性，心是第二性，又何礙乎其為唯心主義的認識論者呢？

不過，我們還得申明我們的論點：

白沙說過：“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與林彥博書）的話。這是白沙從客觀唯心主義走向主觀唯心主義的最好證明。“宇宙在我”與“宇宙便是吾心”又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呢？白沙那段話，我們斷不能把它解作是把握物質世界的客觀真理。因為白沙分明是說“從此理的干涉、運會、而至於天地我立，萬化我出。”這是理生天地，精神生物質，而精神又復歸於人心。這是與他在“無后論”所說：“蓋有此誠，斯有此物”相一致的。

基此，我們更可以進一步考察白沙“和楊龜山”的“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那兩句詩了。我們認為這兩句詩，白沙是要人們摒除外間的物欲，培養人心的善端，這樣才可以達到聖學的境地。這分明是着重內心的培養工夫，是“內省”的一路。白沙肯定人心是善的。這是基於孟子的性善論而來的認識論。我們認為白沙所謂善端，即孟子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這四端。孟子認為只要人們充分發揮這人所本來具有的這四端善性，就可以達到聖人的地步。故他主張存夜氣，摒除物欲。這是唯心主義的認識論。白沙所謂培養善端，避免物欲，這正是孟子的唯心主義認識論理路。我們怎能說這是很好的反映論呢？我們不要以為物欲是很壞的東西。

“物欲”與“聲、色、貨、利”絕不是同義語。大凡飢思食，渴思飲，一切人生日用，男女居室，都在物欲的範圍。它是人類生存的起碼條件。在封建

社會里，物欲問題正是被壓迫階級與壓迫階級鬥爭的重要問題之一。壓迫階級要擴充自己的物欲，而強迫被壓迫階級放棄物欲。相反，被壓迫階級則向壓迫階級爭取物欲的權利。這反映在思想鬥爭方面，就是理欲論的唯物主義路線與唯心主義路線的鬥爭。宋明以來，理欲論在思想戰綫上的鬥爭尤為突出。大凡承認物欲為人們生活的必需條件，只能節，不能免的，這是唯物主義的路綫。這反映了被壓迫階級向壓迫階級爭取生存權利的鬥爭。相反，大凡主張摒除物欲，避免物欲的，這是唯心主義路線。這反映了壓迫階級欺騙勞動人民的行為。白沙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主張“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他認為外間的物欲足以戕害人心本有的善端，反之就是要培養善端，就須摒除物欲。這顯然是唯心主義的認識論。

同時，聞竣同志還提到白沙得道後的“自得”問題。他認為白沙“所謂‘自得’對心來說它起能動作用。但對‘道’來說，它只是被動的。”又說：白沙“把這種‘自得’解成樂道”。照聞竣同志這樣解釋“自得”，則白沙的“道”與“心”關係，彷彿是必然與自由的關係了。可是，我們也不同意這種說法。我們認為白沙所謂“自得”不是主觀能動性的問題，而是主觀決定萬物的問題。故他強調心得道後就“不為物撓”，而不是強調依照客觀規律辦事；強調“安心不好外事”，而不是強調用心處理外事；強調“斷除嗜欲想”，以撤去“天機”的障礙，而不是強調嗜欲人所難免。強調“蓋有此誠斯有此物”，而不是強調本有此物。這正是唯心主義路線的具體表現。

由此可見，白沙的認識論也是唯心主義的。

### 三

最後，對白沙怎樣去得道問題，我們認為他不是從實踐，而只是從事於內心的直觀來求得真理，故白沙得道是一種內省功夫，並不依靠外物。聞竣同志反對我們的看法，說白沙所講的心，不是我們今天所指唯心主義的心，認為白沙亦是借助感覺和理性去得道。這是聞竣同志和我們意見分歧的第三點。

為要說明白沙得道是一種內省功夫，上次我們發表的文章中曾引了四條原始材料作証。聞竣同志不同意我們上次對這些材料的理解，他化了大量篇幅把這四條材料逐條注釋，並引白沙的詩作証，企圖說明他的看法。但我們認為，即使按照聞竣同志

的解释，还是不能证明白沙得道不是由于内省功夫。下面试将这些材料逐条再作商榷。

材料一、“学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于动静有无之机，致养其在我者，而勿以闻见乱之。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虛玄不测之神，一开卷即得之矣。非得之書者也，得自我者也”。（道学传序）

聞峻同志認為白沙這段話是講學習方法的，他引述了兩首原詩來說明白沙是看不起那些以為多讀書就自以為了不起的人；並且主張“明道”不一定要多讀書。

對聞峻同志上述意見，原則上我們亦不反對，不過覺得這不能解決問題。因為這部分討論的焦點是白沙怎樣去得“道”，重內省還是重實踐？而聞峻同志卻單論証白沙“明道”是不在多讀書，這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白沙不倚靠書本並不等於是倚靠實踐來得道，他在自序為學中就說得很清楚：

“仆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有得。……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休，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可見白沙初時是全力從書本中求道的，後來失敗了才改為靜坐，從事內心省察而得道。聞峻同志引述的第二首詩：“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道苟能明，何必多讀書。”這正是白沙從內心修養而“得道”的體會。上引道學傳序的一段材料，亦是說明這一點，他認為為學可以不用耳目聞見的智識和書本相印証，只要凭借虛玄不測之神就能一開卷即有所得。他所謂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非得之書而得自我者，正證明他內心省察的作用。聞峻同志認為這只是講學習方法，把求諸吾心解釋為要自己善于用心學習。但即使如此，試問一個人是否只要自己善于用心學習，就可以不要耳目聞見的智識，只要保持虛玄而變化不測的精神，就能一開卷而有所得呢？聞峻同志解釋這點說：“能够做到這樣有心得，不是靠讀書從書里得來，而主要決定於自己。”那是決定於自己的什麼呢？決定於自己的實踐還是決定於自己虛玄而變化不測的精神？這顯然是後者而不是前者。可見即使按照聞峻同志的解釋，這段材料亦只能說明白沙在學習方法上是一個唯心論者。

材料二、“自得者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顛沛。鳶飛魚躍，其機在我。”（贈彭

惠安別言）

聞峻同志引了兩首詩作証，說明白沙要人“不累”是好的。他說：“在陳白沙所處的那樣的社会里，能够不累，当然是修养功夫深。难道一个不为声色貨利所动，專心致力于求真理的人，就說這個人是唯心論嗎？這樣，只有那些患得患失，一遇小波折就動搖心志的人，才是世界上最唯物論的了。”聞峻同志把“外物”等同於声色貨利，好象不累于外物就是不為声色貨利所动，其實這問題應該分開來說。白沙所謂“自得者不累于外物”，意思就是說人得道後可以不受任何外界事物的影响；“其機在我”亦就是他在自序為學中所說的得道後可以“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的意思。他在“示黃昊”一詩中亦說：“高明之至，无物不復，反求諸身，把柄在手”。這可見白沙認為反身得道後就可以執此把柄而主宰万物，這不是唯心主義是什麼呢？我們不要認為專心致力於求真理的人就一定是一個唯物論者，問題是在於他怎樣去求真理。象白沙認為反求諸身就可以把柄在手，這樣去求得“真理”能說是個唯物論者嗎？其實，人累不累于外物，那是主觀和客觀的關係問題。固然人的主觀是有能动性，但一定要適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才能起作用。象白沙這樣認為“把柄在手”就可以“隨吾所欲”，這種不為物累的人，雖然他能淡聲華而薄名利，但我們還是不能不說他是一個唯心論者。否則，如果按照聞峻同志的邏輯，不為声色貨利所动的人就不可能是唯心論，那麼，只有那些真正做到四大皆空的佛教徒才是世界上最唯物論的了。

材料三，“使心常在內，見到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嘗漫筆後）

聞峻同志解釋這條材料還是用他的老手法，上面他把“求諸吾心”解成“要自己善于用心學習”。這裡“心常在內”就解成要人莫胡思亂想，只是要人集中精神去細察物理。他還說：“在見未到理未明的时候，只有这样做才能成就得大，誰如果反對他（指白沙）这样做，誰就是一個唯心論者”。接着他还引了兩首詩，說明白沙的“心常在內”即是“齋心”，白沙所以成就得大，正是因為他肯白首齋心和與顏淵那樣的“坐忘”，不是上帝賜與他的。還說“為見事明理，（白沙）即使如顏子那樣“坐忘”，孟子那樣“求放心”，這樣的根本學，是會影響他的本體論，使他變為唯心主義者的。因為他的心在內，為了見，為了明，外面還有要見要明的東西在那裡。”

這裡聞峻同志雖然費煞苦心想把白沙說成是唯



物論者，但我們覺得那還是不能自圓其說。因為第一、他把白沙的“心常在內”解為不要胡思亂想並要集中精神，那還勉強可以，但“去細察物理”一句只能算是增字解“經”，因為白沙原文並沒有這個意思。如果認為白沙要見到理明，就一定有物質對象擺在那裡，這只是想當然的說法，沒有什麼證據。其實白沙這段話，正說明他是依靠內心省察來明理，而並沒有細察什麼物理。第二、說白沙的“心常在內”即是“齋心”與“坐忘”，那麼他依靠這樣來獲得成就就應該是唯心主義者，不能由於他有“明理”的目的就可以變為不是。因為問題不在於他要不要明理，而在於如何去明理，白沙既用顏子那樣“坐忘”，孟子那樣“求放心”的辦法去明理，那就很難說他不是唯心主義。誰要是認為一個人只要不胡思亂想，只要集中精神，就可以在“坐忘”中來獲得真理，誰就是一個唯心論者。

材料四、“為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為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不為影響依附，以陷於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書自題大塘書屋詩後）。

聞峻同志認為這裡是要人求學要有個主觀判斷。他說即使白沙自己認為這是“心學”，也只是要人唯精唯一，尤執厥中之意，不等於是唯心之學。

我們的看法和聞峻同志不同，認為白沙的心學就是唯心之學。聞峻同志說白沙要人求學要有主觀判斷，這樣解釋我們不反對，但問題在他根據什麼來判斷。通過對事物的感覺到產生概念然後再運用概念作判斷呢？還是單憑自己內心來判斷？這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兩條不同路綫，而白沙的判斷方法却顯然是屬於後者。我們不要認為他勸陳秉常不要對他隨聲附和，就以為他很尊重客觀真理，象聞峻同志所說白沙自己認為對的尚且要別人判斷判斷一下。其真實含意並不在此。因為他主張道是憑個人內心修養得來的，所以各人應該有各人的“自得”，如果人云亦云，那就沒有“自得”了。他贈陳秉常的詩說：“然否苟由我，與子何有焉”，亦就是這個意思。他自己亦說：“雖然古無聖賢為之依據，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他對已對人都強調“自得”，不盲從，這種精神是好的，但並不能因此否認他是唯心之學。

關於白沙怎樣得道問題，聞峻同志最後提出他的正面意見。他引“病叟山中觀物坐”一句詩，證明白沙是坐在觀物，不是在坐禪；又引“端坐思古

人，寒燈軟悠悠”兩句詩，證明白沙是坐在“思”，沒有打瞌睡。因此得出結論說白沙既“觀”又“思”，誰能否認他沒有借助於感覺和理性去認識“道”呢？意思是說這還是唯物主義的認識論。

對聞峻同志這番正面意見，我們還是不同意。如果說這幾句詩能證明白沙是坐在觀物，不是坐禪；是坐在思，沒有打瞌睡，那麼我們亦可引幾句來詩反証：

“坐老蒲團亦是枯”（次韻廷實示學者）

“一蒲團臥花中央”（自怡堂為增江濶演題）

“坐忘一室內”（八月廿四日颶風多有溺死者）

“歸來乎，青山還我，白雲滿座，莫思商，但高臥”（可左言贈僉憲王樂用歸瑞昌）

如果從這幾首詩的單詞單句來看，我們說白沙在坐禪，在打瞌睡，亦有什麼不可呢？退一步說，姑且就以聞峻同志引的幾句詩來談，我們認為亦不能說明白沙在靜坐中是借助於感覺和理性去認識“道”。其實白沙從靜坐中得道是依靠內心省察而來，並不在於他既“觀”又“思”，上面我們引白沙的自序為學已說得很清楚。另外張東所叙白沙為學，說他靜坐數年，還未有所得，最後“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可見他得道是不需要“觀”和“思”的。白沙在藤蓑第四首詩中說：“朽生何所營，東坐復西坐，搔首白髮少，攤地青藜破，……吾心能自得，糟粕安用那。”亦是強調在靜坐中可以自得於吾心。另外他在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一詩中亦說：“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亦是強調靜坐中一心的作用。而所有上述材料，都沒有提到白沙得道是凭借感覺和理性的認識。

不過這裡要說明一點，就是我們強調白沙得道是由於內心省察，並不等於否認他能夠觀物或思古人。我們認為一個生理正常的人都能夠看東西和想問題的，唯心論者亦不例外，所不同的是他們把人的感覺意識認為是第一性，而物質是第二性。所謂“物體是感覺的複合”，“我思故我在”等一類命題就說明這一點。因此一個人坐在觀物，並不能以此來判斷他是唯物主義或唯心主義，象白沙這種認為“心在萬物上”的人，他坐着觀物，似乎難免這點就說他是唯物論者。

根據這一部分的討論，我們認為聞峻同志並不能證明白沙得道是由於實踐。因此我們還是維持上次的論點，白沙得道還是靠一種內省功夫。



## 大德乎？小德乎？

向群

在高等学校里，整风运动的烈火烧醒了不少同学和教师，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泛滥的灾害被揭露出来了，但是，仍有一些执迷的教授要出来充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辩护士。中山大学有一位经济史教授，死手不放资产阶级在学术上的一套。他声称：学术著作“千百年不倒”，“历久而不灭”；政治性著作则只能“风靡一时”，“如果历史为政治服务就会失真。”在政治与学术的问题上，他认为只要“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似乎只有政治问题才是“大德”，不可不慎重从事，要看风转舵，不能犯错误；学术问题没有大是大非，是私有财产，可以随心所欲，是“小德”，故“出入可也”。

这种故意捏造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说法，曾迷惑了不少同学，影响他们联系实际斗争，怕搞现代史，怕犯错误，一心想埋头搞学术研究，不问政治，朝着白专道路走去。但结果又怎样呢？他的一些追随者还是“大德踰了闲”，在鸣放中暴露了资产阶级立场，犯了政治上的严重错误。而这位“大德不踰闲”的教授先生自己，在双反中不仅立场问题受到了严厉批判，而且他的“千百年不倒”的“史料至上论”也受到了群众的抨击，没有了市场。

“其痛苦之深有如资本家看到自己的资本在贬值和被没收。”（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给这位教授先生当时最好的写照。

事实上，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决不是什么“小德”问题。学术有其阶级属性。我们不能设想：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能够保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当然，学术思想不能与政治立场划上简单的等号。有的知识分子，政治上虽有拥护党的一面，但由于长期以来饱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所以在学术上依然是白旗飘扬。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是彻底改造好了的新人；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不在学术思想上拔掉资产阶级白旗，插上工人阶级

红旗，接受马列主义指导，那末，他那种业务上与党的抗衡，最后必然会导致在政治立场上与党相对抗。比方说，在教育思想上如果拒绝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便会形成在立场上与党相对立。人民日报指示：“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这对于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正确认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很好的启发。

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与马列主义是针锋相对的“大德”问题。我们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关系到国家建设人材的培养。就历史科学而言，如果让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保存于我们的教学工作中，就决不可能培养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战士，只能是一些藏在象牙塔中醉心名利的社会蠢虫。因此，若任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自由存在，以厚古薄今的态度和繁琐考据的方法来教育青年，就意味着这些白旗手在和党争夺青年，和马克思主义争夺阵地。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能说是“小德”而“出入可也”？

今天，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已经失去了在我国赖以依存的社会基础，已经成为我国文化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人的改造，都是迫切的任务。当然，学术思想批判属于思想改造的范畴，是长期艰巨的工作，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来对待，但我们必须坚持斗争。

在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时候，如果我们曾经一时由于还没有彻底地解放思想，还没有破除对权威对学术的迷信，因而在斗争中曾表现得犹豫和软弱，那末，在党和毛主席一再号召我们破除迷信，使我们得到启发后，就一定要坚决向那些至今仍想霸据一方的资产阶级学者宣战，在斗争中锻炼自己，坚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插遍历史科学的领域。

# 为共产主义鳴鑼喝道

希 梁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胜利，使人们更坚定不移地确信：共产主义已不是将来的遥远的事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这句话，确切地反映了群众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但人民公社化运动毕竟是生产关系的大变革，不仅涉及到生产范围的大变动，而且关涉到生活方式的大改变，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们，对此会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就是那些思想先进的人，有时也会由于只看到眼前利益，或者对新的生活方式一时不习惯，而产生某些疑虑。因此，大力开展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为共产主义鳴鑼喝道，是当前思想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正如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一条按语所说的：“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我们必须要在思想领域上高举共产主义红旗，拔掉一切资产阶级的白旗和灰旗。

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极大提高，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备条件之一。今年大跃进以来，特别是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共产主义萌芽的东西到处都有，人们的精神面貌处在一个深刻而急剧的变化过程中。不少先进人物怀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崇高理想；不少人具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德品质，他们鄙弃资产阶级社会那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生活准则，他们处处表现出先公社、后自己，先别人、后个人的可敬行动；不少人在生产和工作中显出“不计报酬、忘我劳动”的劳动态度，他们把劳动看作是乐生的手段，生活的第一需要，摆脱了“体力劳动是下贱的”的精神束缚；还有不少人充满着目光远大、不断革命的英雄气概，他们的工作从不退坡，革命意志昂扬，意气风发，事事起模范，关关是先锋。所有这些已出现的新人新事新思想，都是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的表现，要我们“大喊大叫”，通

过宣传和教育，树立旗帜，指明方向，使它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股巨大的洪流，在巩固人民公社的新制度中起决定作用。

事物总是有它的对立面。在大立共产主义思想的同时，还必须大破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本位主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这个问题在知识份子中更为严重。如建立农村人民公社，农民实行粮食供给制和基本工资加奖励制后，就听到这种反映：“农民不能和我们比，知识份子每月要订十多份报纸”。他们把阶级社会出现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的现象，及由此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固定化和肯定下来，并认为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有些人或恃其拥有某种专业知识，或据有若干技术本领，总感到自己和劳动群众“不一样”，并以此来炫耀自己的“特殊”。他们不愿意把各种“专家”衔头还于劳动人民之中，而要居于群众之上或之外。这就是说，这些人思想上受到资产阶级法权影响很深，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美化了，而不是把它看作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出现的東西，是社会的“缺陷”，并一定为更进一步的平等关系所代替。这样，他们就缺乏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准备，没有消灭自己陈旧的观念的决心。应该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走群众路线的方法，坚决彻底批判知识份子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残余，进一步改造思想，毫无保留地和资产阶级等级观念作最后的决裂，扫清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的障碍。

“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是我们当前的时代特征，它要逐渐成为全体人民日常生活中处理一切问题的一项准则。共产主义思想的火焰燃烧得越旺盛，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步伐就会越快速。让我们都为美好的共产主义鳴鑼喝道吧！

## 評陈著“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

張 磊

作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孙中山的战斗的一生貫串了两个历史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前一个阶段中，孙中山以鮮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与改良派进行了尖銳的斗争，并且領導了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多次起义，推翻了綿延已久的封建王朝；在后一个阶段中，孙中山采取了国共合作的明智的路綫，并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应当承認，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人物的研究工作是作得很不够的。因此，陈錫祺先生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一書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这本书比較系統地論述了孙中山的初期革命实践和理論，并在某些問題上作了有意义的探討。作者为自己的著作規定了这样的任务：“通过具体历史事实和历史条件，說明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与革命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指出它的进步和缺点”。毫无疑问，任务及其达成方法是无可非議的，但是，它們在著作中并未圓滿实现。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作者片面地，违背客观实际地夸大和渲染了孙中山的活动中的积极方面，而对于消极方面則缺乏，甚至沒有“从历史条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因而，書中对于孙中山的論述就不能不是片面和不正确的。

下面，仅就几个重要問題加以論述。

\* \* \*

陈錫祺先生这样論述了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已經不再是一个种族复仇主义者，民族主义“不仅为救支那亿万之蒼生，而且为雪整个亞洲黃种之屈辱。……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綱領，虽在他的一生的最后几年中才公开揭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但在伦敦蒙难以后，他的民族主义的内容，却已含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的精神”（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頁47）。

显然，这种論断是夸大的和片面的。

毫无疑问，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当着孙中山开始踏上政治舞台时，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占有突出的地位：它在对外意义上是备受侵袭的半殖民地；它在对内意义上是一个民族“宰制于上”的民族牢獄。这一严峻的现实最大限度上决定了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内容。孙中山繼承了农民階級和社会下层分子所持有的民族革命斗争路綫，但又淘汰了其中的籠統排外主义和宗法落后色采。孙中山接受了把中国的民族独立与資本主义化相互联接起来的改良派观点，但又唾弃了其中的妥协主义路綫。此外，法蘭西十八世紀革命的口号——“自由”和林肯的“民有”主张也被攝入民族主义思想。这样，孙中山所揭櫫的民族主义旗帜就成为民族运动新阶段的标志。

反滿、推翻滿洲貴族集团的統治——这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动員作用，因为，不仅滿洲貴族集团与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之間存在着矛盾，而且滿洲貴族統治集团乃是侵略者在华統治的牆脚：它以自身的昏庸糜爛統治所造成的社会落后状况为侵略者鋪平了道路，而又充当起列强在华奴隶总管的角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何社会革新事业都不能不触动清朝政府，任何革命运动都不能缺少“反滿”的内容。它成为民族主义的主要課題完全是合乎邏輯的政治现象。

其次，避免瓜分厄运和蒙難的、消融于“反滿”課題中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傾向乃是孙中山初期革命活动中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的另一内容。这一内容不应忽視，但也不能作过高的估計。如同許多先进的中国人士一样，孙中山也是在民族危机日深和爱国主义浪潮高涨的日子里开始了最初的革命活动，因而，严峻的现实就不能在革命者的政綱上打下印記，賦予它以鮮明的救亡色彩。在他看来，民族危机所以如此严重，乃是因为“政府不振作也，人民不奋发也”，兼之“有滿清政府为之磨弋”。因而，

爭取民族獨立的關鍵就是“先倒滿洲政府”。而一旦“政府若有振作”，就會立即使得“外人不敵側目也”。這裡，除去“先倒滿洲政府”一點外，全部觀念都未能超出改良派在同一課題上所持見解的深度和廣度。可見，籠統地斷言孫中山在初期活動中所倡導的民族主義“已含有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殖民主義的精神”是誇大和片面的。

民族主義除去上述的積極方面和革命意義外，還有着不可忽視的缺陷和消極因素。缺乏明確的反帝內容，沒有提出反帝的綱領和口號——這是民族主義的嚴重缺陷之一。毛澤東同志指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因此，民族主義只有鮮明地提出反帝綱領，才能確切地反映客觀實際和科學地概括民族解放鬥爭的任務，從而把存在於人民群眾中間的素朴的反帝情緒和鬥爭匯成一股巨流。孫中山在民族主義中則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只作了模糊的闡釋（例如，過分強調民族危機是由於“政府不自振作”，因而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升脫了帝國主義的罪惡），並且把這樣一個首要的鬥爭任務消融於另一個狹小的、不相適應的任務（反滿）之中。這樣，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軍政府宣言中的對外部份是那樣地軟弱無力，而孫中山則在迭遭挫折後仍然對帝國主義抱着輕信與幻想的態度。

其次，一定程度之大漢族主義乃是民族主義的另一個重要缺陷。這種傾向主要表現為孫中山既然承認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但又把中國歷史的發展完全歸結為漢族歷史的發展；在強調漢族的燦爛文化和偉大貢獻的同時，卻無視，甚至丑化其它民族——特別是滿族。這樣，就不能實事求是地考察少數民族的獨特社會生活狀況及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貢獻。也難以制定真正的民族平等政策（例如，孫中山在他的後期活動中還會一度主張“把漢滿蒙回藏都同化於我們漢族，建立一個大民族主義的國家”，這種主張雖然在本質上有別於歷史上的“俄羅斯化”、“馬扎爾化”和“日耳曼化”，但也是錯誤的和不合時宜的）。此外，與上述缺陷相聯繫，種族主義的色彩也並沒有完全從民族主義綱領中消失。應當指出，滿洲貴族集團與漢族和其它少數民族的矛盾只能處於從屬地位。把漢族和滿族作為“華夏”與“隴虜”而極力對立起來的種族主義色彩，不僅會妨害人們認清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實質，也與近代民族運動的內容和形式很不調諧。

顯然，沒有上述分析就不能對民族主義作出全面的評價。

民權主義乃是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政綱的核心。

陳錫祺先生這樣論述道：“1897年後，經過实地考察，他對歐美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主張就更堅定了。……孫中山民權主義思想到此已含有具體而生動的內容”（同盟會成立前的孫中山，頁45—46）。在另外的地方更涉及孫中山的關於政體的學說：“孫中山覺得歐美等國的憲法，仍存在很大的缺點，後來他根據中國歷史的特點，創倡五權憲法的理論，於立法、行政、司法之外，增加考試、監察，補充三權分立學說的不足”（同盟會成立前的孫中山，頁40）。

這種論述是空泛的，而對於五權憲法的評價則只是無批判地重復了孫中山自己的闡釋而已。

顯而易見，民權主義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因為，反對封建君主制度、爭取自由和民主是近代中國革命戰士所一致關注的基本課題，也是民主革命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孫中山繼承了農民階級對於“皇帝和貴族”政權的革命鬥爭傳統，但又消除了他們的皇權主義思想；孫中山接受了改良派重視政治變革和仿效西方國家的觀念，但又摺棄了他們的妥協主義。此外，法蘭西十八世紀的革命口號——“平等”和林肯的“民治”主張也被攝入民權主義思想，而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則成為孫中山在現實中借鑒的楷模。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也給予民權主義以某些影響，它們主要體現在有關政體規劃的部份中。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原則的共和國——這就是孫中山革命活動萌芽階段的民權主義的基本內容。

民權主義乃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個共和國方案，它不可避免地當前的思想領域中引起巨大的革命。但是，民權主義存在着不可忽視的缺陷。對於這些缺陷的分析並不意味着“苛求”，而是全面評價民權主義的必要工作。

首先，民權主義的中心內容乃是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既沒有發動人民參與鬥爭和從而使之掌握政權的內容，也沒有為人民群眾的政治權利規定真正的保證。孫中山在政體方面的設計雖然煞費苦心，但也無從改變共和國的階級性質。例如，孫中山會把五權憲法贊揚為“破天荒的政體”，可是，它在實質上還是三權分立原則的變形。五權憲法並沒有脫出資產階級政治學中的分權論的窠臼，而分權論不過是資產階級政治學家的把戲——把國家機構的分工渲染為分權而已。

其次，对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采取无保留的倾慕态度乃是民权主义的又一个重要缺陷。当然，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较之封建君主制度是前进了一步，而孙中山也真诚地相信仿效西方会带来文明和幸福。但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意味着“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当代的先进人士已经完全有可能窥见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虚伪和溃瘍。被列宁称为“大胆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反对自由主义”的赫尔岑这样抨击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两者都是奴隶制度，一边是狡猾的，用自由名义掩饰着的，因而也是危险的；另一边是野蛮的、兽性的、因而也是触目惊心的”（自彼岸来）。显然，把孙中山与俄国的民主主义者相较，是不能算作苛求的。孙中山在上述课题中有可能跨进更远，但事实上他却停留在天真的倾慕和仿效阶段。

\* \* \*

民生主义乃是孙中山进行“社会革命”的旗帜，它成为三民主义体系中最能显示其所处历史条件和所属阶级特色的有机组成部分。

陈锡祺先生这样论述了民生主义的积极意义：“伦敦蒙难以后，考察了欧洲各国的政治，又受了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他才认识土地革命是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基础。他的平均地权的思想就是这样产生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页8）。并且指出“这种思想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对中国农民痛苦遭遇的恳切同情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刺激”（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页43）。而对于民生主义的消极方面则仅作了这样的论断：“他却接受了社会改良主义者亨利·乔治的理论，企图用不流血的方法解决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这不能不归于孙中山本身的阶级局限性。正由于他不能辨别真社会主义与假社会主义，错误地接受了资产阶级和平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问题的理论，他虽具有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和‘预防’资本主义的善良愿望，但和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仍有很大的距离，因而削弱了号召群众和打击敌人的力量”（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页47—48）。

显然，上述论断又是夸大积极方面和缩小消极方面的一例。

当然，民生主义的提出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孙中山继承了农民阶级的素朴的经济平等观念，淘汰了其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孙中山接受了改良派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又抛弃了他们力

求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立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空想社会主义在民生主义中留下了痕迹，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论则成为孙中山所直接撮取的素材。此外，古代中国的经济制度也给予了孙中山以一定程度的影响。采取“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的手段和步骤，以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原则；实行“实业主义”（资本主义工业化）——这就是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尽管民生主义涂饰着一层民粹主义的色彩，但其实质则是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平均地权”——“土地国有”不仅不会“预防”资本主义，反而促进了资本主义。

民生主义具有严重的缺陷。首先，在土地问题上没有达到如陈锡祺先生所说的“土地革命”的高度，恰恰相反，民生主义中对于农民的土地问题和解放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和估计。尽管某些著作从侧面记叙了孙中山曾把民生主义与改变农民境况的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事实，但是，在具有纲领性的文献中却没有这样的内容。无可置辩的事实乃是：一方面，孙中山把自己的土地纲领主要作为防止垄断——资本主义祸患的手段（例如孙中山曾经认为“欧美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是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另一方面，与上述观念相联系，孙中山的土地纲领的主要着眼点不是与农民利益攸关的农村耕地，而是“市地”（当然，还有它的“涨价归公”）。可见，农民的土地问题和解放问题在孙中山早期所倡导的民生主义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一种还未曾体现于纲领中的观念而存在于孙中山的头脑中。

其次，孙中山的土地纲领对于地主阶级表现了妥协的、改良主义的倾向。一方面，孙中山反对采用暴力手段，不主张“夺富人之田为已有”；另一方面，孙中山又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便尽可能少地损害地主阶级的利益。显然，这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它只会带来消极的政治后果。

再次，民生主义所包含的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企图也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观点，混淆革命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的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个任务……合并到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新民主主义论）。

## 稿 約

(一) 本刊歡迎投稿。

(二) 本刊特別歡迎下述性質的稿件：

1. 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觀點和社會科學原理闡述我國當前政治上、思想上、學術上的重要問題；特別歡迎闡明毛澤東同志著作的研究論文、讀書筆記、學習心得等稿件。
2. 批判資產階級的哲學思想、社會科學理論等方面的研究論文。
3. 通俗闡明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和社會科學基本問題的著作。
4. 華南地區的科學研究資料和學術性調查材料。
5. 國內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的評介。

(三) 本刊文字以語體文為主，要求盡量精簡，一般不超過六千字。來稿請用稿紙謄寫清楚，並示詳細地址。不擬採用的稿件，負責退還。

(四) 來稿發表後，即奉稿酬。

(五) 來稿請寄：廣州市越秀北路 222 號中國科學院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內“理論與實踐”編輯部。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主办

上游

扩大征求订户

“上游”杂志是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主办的综合性的理论刊物。它的任务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总结广东省实际工作经验和指导广东省的实际工作。每月出版一次，每册定价一角五分。欢迎到当地邮局、发行站订阅。

上游杂志编辑委员会编  
上游杂志社出版  
广东省广州市邮局发行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 零售、代订处：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理论与实践

月刊

1958年第11期（总第11期）

编辑者：理论与实践编委会  
广州越秀北路中国科学院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大南路43号

1958年11月15日出版

印刷者：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者：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预订处：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本刊代号：46—71

刊号：（穗）0368

印张：2张

定价：每册二角